

# 民族研究情报资料

摘 编

4

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处编



民族研究情报资料摘编  
第四期

---

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处编

一九八六年七月出版



## 目 录

### 民族研究文摘

我国民族团结的大趋势.....	( 1 )
社会商品经济发展中的“竞争”是否影响民族关系.....	( 2 )
试析民族形成问题.....	( 3 )
“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一解.....	( 5 )
政治人类学：控制性的策略.....	( 7 )
天山附近的回鹘王国.....	( 8 )
对待语言和语言集团的态度.....	( 10 )
越南少数民族的双语制度：影响普及的诸因素.....	( 11 )
尼夫赫人族源问题.....	( 13 )
突厥语文.....	( 14 )
突厥语分类问题.....	( 17 )

### 民族研究动态

关于民族志资料的品质问题.....	( 18 )
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的热潮正在兴起.....	( 19 )
台湾人类学界简况.....	( 21 )
关于高山族研究.....	( 22 )



澎湖考古概述·····	(23)
《蒙藏文物特展》简介·····	(24)
花山崖壁画研究近况·····	(26)
丝路艺术史的开拓性研究·····	(28)
介绍民族音乐学·····	(29)
计算机语言学在突厥语研究上的应用·····	(31)

### 民族研究新书介绍

蒙古古典诗歌研究的新开端·····	(32)
论阿第盖人劳动技能的培养·····	(33)
阿巴扎人·····	(34)
费孝通《生育制度》、《江村经济》两书日译本出版·····	(35)
卡罗·克来默(主编):《民族考古学论文集》一书简介·····	(36)
《西藏考古》介绍·····	(36)
白鸟芳郎新著:《华南文化史研究》·····	(37)
彝文《〈劝善经〉译注》出版·····	(38)
《恩加那善人:社会结构与信仰》·····	(39)
《亚——太——美双语教学之前景:比较研究》·····	(40)
简评《台湾土著的神话·传说比较研究》·····	(41)
《克木人民间故事》(第三卷)介绍·····	(42)
国外中亚研究·····	(42)

### 学术团体·机构

中国突厥语研究会·····	(43)
国外突厥语研究机构·····	(44)
附:突厥语族的语言文字·····	(46)
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在苏州举行学术座谈会·····	(9)
评佐佐木高明的《照叶树林文化的传播道路 ——从不丹、云南到日本》·····	(封三)

# 我国民族团结的大趋势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政治、经济形势,从根本上改变着国内各民族的面貌,决定着民族间交往关系发展的基本方向和中国民族团结的大趋势。

**一、民族工作指导思想上的重大转折将促使我国民族关系出现一个大团结、大发展的新局面。这是一个必然趋势。**

建国以后,在民族工作中,我们也有过重大的挫折和失误,其中包括某些理论上和指导思想上的失误,曾给我国的民族工作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影响到民族关系的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使我国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崭新的形势。这一变化集中到一点,就是在民族工作上正确的指导思想的确立:明确了我国现阶段民族关系的性质;明确了社会主义时期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中心任务;明确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和重要性。这样,就为我国民族关系的新发展,为民族团结的进一步增强,奠定了牢固的政治基础。

**二、统一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决定了我国民族关系的根本趋向。**

从历史上看,几千年来从分散到统一,从战乱到安定,历尽沧桑变迁,最终归为统一的大局,归根结底是由于“中国”这个大社会有着必然统一的内在规律,始终存在着和发展着一种强大的内聚力。“合则两利,分则两害”,谁也离不开谁,可以说是我国民族关系自古已然的一个客观规律。在今天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统一的四化建设事业和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已经把我国五十六个兄弟民族的发展繁荣和共同的利益和命运,连接得更加紧密了。由于统一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有着根本利益一致和局部利益的互惠互利、取长补短及相互支援,因而极大地增进了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和友谊。民族间团结与合作的日益扩大,是我国统一的四化建设的客观需要,也是我国新时期民族关系新发展的合乎规律的一个大趋势。

**三、经济振兴为我国民族团结关系的新发展带来了强大的推动力。**

我国城乡的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少数民族经济建设事业获得了新的活力和生机,改变了以往民族的交往范围和规模的很大局限性。特别是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生产社会化和商品化的过程,有力地推动了少数民族社会结构和社会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从而进一步扩大了民族间的相互交往关系,逐步缩小了民族间由于经济文化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而存在的隔阂与差距。随着农牧业生产的现代化、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民族工业产品的复杂化,就必然引起民族间生产协作、技术交流以及社会生活交往等方面联系的更加紧密,更加扩大和深化。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普遍趋势。而在民族内部,社会分工的发展,工人队伍的

(下转第4页)



---

#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中的 “竞争”是否影响民族关系

---

在最近举行的第三届全国民族理论学术讨论会上，与会者就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中的竞争对民族关系的影响问题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给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范畴引进竞争原理。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在新时期出现的新变化和新情况。竞争是历史赋予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新功能，它使各传统的内向型、封闭型的民族，向外向型、开放型的民族转化，进一步增强了我国各民族的进取精神，把某些少数民族的“输血”功能转化为“造血”功能，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固有格局，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增添了新的生机和新的活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竞争”原则要在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上作出反映，是符合逻辑的。竞争中有互助，互助中有竞争，互相连接而又互相依存，互为补充，互为促进，从而使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体系改变呆板模式，各族人民在民族交往中的积极性得到了最佳发挥。“竞争”原则进入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范畴，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这个有机体的社会功能的“二次开发”，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的一项重大发展。

另一种意见是反对上述看法，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平等、团结、互助的关系，不能加上“竞争”。商品经济不是以民族来划分。我国各民族是交错杂居，只有民族地区

的经济，而没有单独的民族经济。发展民族地区的商品经济，虽然因价值规律起作用而必然会有竞争，但是以利润为目的的竞争与互助是互相排斥的；民族是具有四个要素的人们共同体，不是经济实体，民族之间如何能开展竞争？如果说商品经济发展对民族关系有什么影响，只能是各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更多，共同因素增长，某些风俗习惯改变更快。因此，我们不能把竞争的概念引进民族关系。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的民族关系只能是平等、团结、互助的关系，不可能是“竞争”的关系。

第三种意见认为，商品经济的“竞争”会反映到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上来的，但是是否在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上还要加上一个“竞争”或加何表达较确切些，值得研究。每个民族都应该有竞争精神、向上的精神，提倡相互竞争。但是，应在国家监督下的竞争，不能是盲目的竞争。若是后者，少数民族就要吃亏，若是竞争发展成为优胜劣汰更是危险的。要好好研究竞争、促进、扶助的关系。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基础差、底子薄，在商品竞争的冲击下，已经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一些地区和民族手工业面临严峻的考验，处境艰难，如不采取特殊的政策和措施，必将拉大民族之间的差距，影响平等、团结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供稿：金炳镐

# 试析民族形成问题

关于民族形成问题，最常见的论断是：由部落发展成为民族；也有人提出：民族是在部落或者部落联盟的基础上产生的；还有人主张民族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最常见引用来作为民族形成问题立论根据的，有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两部著作中的大量论述。

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论证民族形成的问题上，作为论据，尽可以从马克思的《摘要》和恩格斯的《起源》两书中摘引出一、二十条涉及“民族”的论述中，然而在所摘引内容中存在的前后相伐、上下相违的地方，却往往有所忽略。作者曾尝试采取概念体系与理论体系相结合的办法，对照研读以上两部著作，结果发现有些问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澄清。

1. 过去研究古代社会的著作，对于我们今天译解为“民族”的 Nation 这个术语，在使用上是极不统一的：有时指“部落”，有时又指“部落联盟”。一般说来，凡是单独拥有一定地域和方言的社会组织都可以称之为 Nation。

2. 原始氏族社会的最高发展阶段，连同表达其社会组织的术语 Nation，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史前人类社会研究理论体系中所特有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之后才更为明确起来的。

3. 人类社会只有经过氏族、胞族和部

落，这个历史发展阶段才逐步由原生的社会形态向次生的社会形态过渡，原有的社会组织逐步发展为政治组织。

4. 当我们把原始社会氏族制度的经验总合在一起时，其社会组织的有机序列应当是：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和 Nation 这样五个阶段，或者说是层次。

5. Nation 作为一个术语，代表的是一种部落共同体，其具体的形成方式，一般说来，乃是在同一地域范围之内部落的“联合”，亦可视之为“统一”，理解为“部落联合”似较恰当。因此，若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上述著作中的有关论述作为依据，只能得出“在部落或者部落联盟的基础上产生部落联合”这样一个结论。

在探讨民族形成问题理论时，屡见应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所讲的“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这段话。首先应当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早期著作和后来的著作中，在某些术语概念的使用上是有发展变化的。其次，在这段论述中可望成为论证“由部落发展成为民族”关键所在的“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这句话，按现有字面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试想一个抽象的概念（地方局限性）如何能够向一个具体的事物（民族）过渡呢？

同时，还经常遇到这样一种提法，叫做“民族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如果理解出



入不大的话，这显然意味着当人类社会还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时，并无民族之可言；只有发展到了以地缘关系为基础时，才出现民族。如此，既误解了“民族”，又没有搞清楚什么是“地缘关系”。

所谓“地缘关系”，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所阐述的建立在地域联合基础之上的关系，它是在氏族制度的“血缘关系”逐渐崩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新型关系。因此，“地缘关系”的形成并不是在 Nation 的形成之先或者是 Nation 的形成同步，而是在 Nation 趋于瓦解之际才开始出现萌芽的。

我们探讨民族形成问题，首先遇到的仍然是基本概念与命题判断问题。其实就以这个所谓的“民族”而论，它原本已有自己的定义。在没有统一定义的情况下，笼统地讨论所谓“民族”的形成问题，就只能出现上述之类“民族”形成的各自争鸣，而根本无法从基本点上取得思想认识上的一致。

原作者：王明甫

王海青 摘自《云南社会科学》1985.4期

<><O><>

<><O><>

<><O><>

（上接第1页）

扩大，知识分子比重的增加，城镇人口的发展等等，都进一步给各民族的相互接近和合作以极大的推动和活力。

民族地区经济的大发展中，将形成改革、繁荣、团结三者之间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和良性循环。在现在和今后长期进行的改革和建设过程中，我国各民族间的团结和合作，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了。

#### 四、改革与开放后的观念变革是我国民族团结大趋势的重要思想基础。

就民族关系方面来讲，在旧社会形成的传统观念形式很复杂，但其核心，归根结底是一种小生产者的狭隘、保守观念。新中国成立后，这些旧的观念有了很大变化，但是还没有完全摆脱小生产观念的束缚。三中全会以后城乡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的全面推行，对这些小生产的思想观念，是一次有力冲击，人们从狭小的保守王国里，一下子开阔了眼界，观念上有了很大的转变。首先，人们对世界的观察中发现，开放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今日世界已日益成为息息相关的整体。”各民族地区间也同样如此，这是一个共同的趋势。开放，是发展民族间交往与合作的广阔天地与巨大动力。其次，在实行改革与开放政策的形势下，作为地区经济的民族地区和内地兄弟省份之间，通过相互协作和支援，迅速扩大了彼此的横向联系，当然也就迅速扩大着民族间的交往与联系，促进了民族间的合作与团结。第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区经济逐步实现了从封闭型向开放性的转化，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各族人民同兄弟民族发展广泛交往的自觉性。

原作者：邹剑

金炳镐 摘自《内蒙古社会科学》86年1月



## “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一解

关于民族的形成问题，许多同志都同意它是由部落发展而成的，即所谓“从部落发展成为民族”。其理论根据，当然都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论据就要数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所说的“从部落发展了民族和国家”这句话了。

当然，恩格斯的这句话果真能够成为我们探讨民族形成问题的根本理论根据之一，成为解决我国各民族乃至世界各个民族形成规律的一大关键。然而，问题还有另外的一面，如果说这句话在原著中的原旨真的并非象我们有一些同志所理解和所说的那样，后果该是如何呢？作者认为：最大的可能是原始社会的“民族”，即所谓由部落发展而成的这个Nation，虽然在中、外文中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那个“民族”是一个词，实际上却别有它解。

**一、这句话中被译解为“民族”的Nation，实际上是介乎部落与国家之间的、原始社会的一种社会组织。**

首先让我们从普通的修辞与逻辑的角度来分析一下“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这句话。

“民族”、“部落”这些术语，在经典著作中，原本都是原始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的称谓，并非人们共同体的称谓。“部落联盟”也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是部落的共同体。只有在研究人们共同体的

历史发展时，才有必要把“氏族”、部落、“部落联盟”这些社会组织的称谓移作人们共同体的称谓。“国家”则是政治组织。

显而易见，在这句话里所包含的“部落，Nation和“国家”三个基本概念之中，既然“部落”是原生形态社会的社会组织，“国家”是次生形态社会的政治组织，那么Nation只有也是一种组织形式时，三者之间概念的相容并列关系才能成立，这个论断才符合逻辑。如果我们把Nation作为人们共同体来理解，结果这句话就变成以一种社会组织发展成一种人们共同体和政治组织，同类事物（组织）和不同类事物（人们共同体）形成因果，使组成这句话的三个基本概念之间出现了不相容关系，这句话本身就成了一个不可理解的判断了。

其实，就因为这句话里包含有“国家”这个中心概念，同时又存在“国家是政治组织”这样一个内在的既定条件，我们只有直接了当地把“部落”Nation和“国家”三者同时视作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或者说是不同层次的组织形式，才能构成符合逻辑的思维。由此可见，恩格斯在此文中所说的这个Nation，实际上指的是介乎部落与国家之间的、较部落更为高级发展阶段的一种社会组织，是一种还没有脱尽自然发生的共同脐带的部落共同体。

**二、从根本上讲，“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这句话中心是讲国家的产生的，**



愿无兼论“民族”形成之意。

劳动本身一代一代地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除打猎和畜牧外，又有了农业，农业以后又有纺纱、织布、冶金、制陶业和航行，同商业和手工业一起，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这就是说，劳动不但在从猿到人、从猿群到人类社会的转变过程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由于人的手、发音器官和脑髓在社会中共同作用，劳动本身世代代不断发展，进而导致人类社会自然发生的共同的解体，由原始氏族制度下以血缘联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转化为阶级社会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政治组织或国家。不能把“由部落发展成了民族”这样一个论断说成是马克思或者是恩格斯提出来的，他们并没有讲过这样的话；同时，更不应该为了立论的需要，硬是把恩格斯论证过的“从部落发展成了Nation和国家”。这个结论的核心“国家”一词抽掉。

三、“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这句话中被译解为“民族”的Nation，作为部落共同体的称谓，不是“部落联合”就是“部落联盟”，并非是“民族”

任何一门科学，无论是属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思维科学，都是由一系列基本概念和命题构成的。没有一个明确的、统一的概念体系，也就无法建立起一个科学的严整的理论体系。研究并掌握这些理论概念的发展变化，对于我们学习和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无益处的。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句话中Nation可能代表的内容。

我们知道，氏族制度的伟大，但同时也

是它的局限性，就在于这里没有统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当部落发展成为部落联盟时，实际上也就开始走上了氏族制度自身崩溃的历程；而国家就是在不知不觉之中，靠部分地改造氏族制度的机关，部分地用设置新机关来排挤掉它们，并且最后全部以真正的国家权力机关来取代它们而发展起来的。从这个角度考虑，特别是还考虑到此文写作是在《家庭私有制国家起源》之前，那么，即便认为此处的Nation是指“部落联盟”也未为不可。

恩格斯《作用》一文的写作时间也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之前；但是，作为《自然辩证法》全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最后脱稿也可认为在《起源》之后，亦即在研究过摩尔根的最新成果之后。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妨把两种可能性同时都估计到；如果说恩格斯在《起源》成书之后对《作用》一文进行过修改，我们可以认为这句话中的Stamm已经是单指“部落”，而Nation指的就是“部落联合”；如果说未曾进行过修改，那么根据当时使用术语的习惯，除了把Nation理解为“部落联盟”之外，似乎还应考虑把其中的Stamm理解为“包括氏族和部落”才较妥当。不过，必须看到，无论属于那一种可能，都不影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起源理论的正确理解，而这句话中的Nation确非人们头脑中所臆想出的，直接作为人们共同体来理解的那个“民族”。

原作者：王明甫

王海青 摘自《民族研究》85.5期





# 政治人类学：控制性的策略

本文所讨论的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是以集中研究行为个体及其在政治舞台上的策略为基本特征的。在这个方法产生的初始阶段，我们把它叫作行为理论（action theory），它与一系列的理論结构相关联，其中有那些围绕着交易、象征互动、系统分析、个人主义方法论、对策理论、互动理论和政治依附制度等理论建立起来的理论结构。今天，行为理论与马克思（Marx）和韦伯（Weber）的辩证法和普通社会学有着密切联系。

政治人类学中的行为理论既不同于社会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behavioralism），也不同于政治学中的行为方式（behavioral approach），尽管它与这两者时常相混淆。这些原则一般是先着手分析个体及其动机，继而强调选择性，最后从行为中推导出结构界限。人类学中的行为理论先是确定个体在正式的和填隙式的社会组织中的位置，然后着手分析政治行为和互动作用。而政治人类学本身，其方法论与进化人类学和结构人类学不同，它注重的是行为过程和政治形态，而不是范畴和团体组织。更为重要的是，它以别具一格的田野工作为基础，并由此产生了经过细致加工的政治民族志的独特形式。

政治人类学中的行为方法论显然来自社会人类学，它伴随着对第三世界社会变化的分析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非洲，研究的重点放在当代社会形势上，政治行为者在那里进行着面对面的冲突。村落头人在殖民主义的行政结构中处于中间位置，这种状况在他身上造成了多角色的冲突，正是围绕村落头

人及其角色冲突这个主题，大批相互连贯的著述被炮制出来。在印度，如何把村落与其较为广泛的行政和政治背景联系起来的问题和对于国家政治党派、选举以及结构变化进行研究的任务促进了对国家范围内的政治行为的广泛和系统的分析，并且为了给在分离的政治舞台上发生的角逐行为制定详细的原则提供了一个概念工具库。在拉丁美洲，研究的重点长期放在民族脉络和历史条件上，农村社团的边际性和文化中介人的作用是其兴趣所在。

出自于对社会变动的现实状况的共同关心，两个支配着政治人类学方法的主题产生了：1. 个人间面对面的冲突，2. 对囊状或封闭式社团中的这些冲突进行特别调节。到了60年代，政治人类学从以前主要对处于表面平衡状态的政治结构作共时研究，发展出一种新的理论，这种理论是针对派别、政党和政治策略的。

近年来，一系列相关的概念发展了起来。一些概念涉及到从行为个体的联合中产生的政治形式，其中有准群体、行为集合、小集团、邦伙、派别、联盟、利益社群、党派；另一些概念与政治行为方式相关，有选择、扩大、决策、谋略、互动、交易、操纵、螺旋式发展、补充、排除、权术、竞争、战争、统治、囊括；还有一些概念与政治行为的背景（时间的和空间的）相关，其中主要有事件、情景、范围、领域、政治体系、环境和权力结构。

目前，政治人类学的行为理论已经把研

# 天山附近的回鹘王国

(苏) 吉洪诺夫

回鹘由于被吉尔吉斯人打败而由鄂尔浑河迁往天山。874年他们在天山战胜了西藏部落，并在广阔的地区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回鹘王国的行政机构是按领土的特征建立的，但在其结构上仍保留有游牧组织的一些特点。国家制度符合回鹘社会封建关系的水平，管理机构随着社会本身和国家的发展日趋完善。

在国家机关中人数最多的是管分配和征收各种税的官员。国家元首是具有亦都护（至高无上的幸福）称号的可汗。亦都护是绝对最高民权和军权的执有者和法官。重要案件由汗本人在王宫前面的广场上审理。不言而喻，没有成文的法律，决定是按照亦都护自己的意见和存在于人民中的习惯法而作出的。但亦都护只解决主要案件，次要的纠

纷和犯法行为由其他人审理。可能，没有专门的法官，一切纠纷都由伯克在村长的帮助下解决。

在回鹘王国的行政机构方面还存在着南北的差别。天山以南地区分成了一些地缘单位；以北，人们继续从事着游牧业，氏族传统保留得比南部多，行政区划仍是按原来氏族部落的特征建立。氏族部落单位首领是最高行政管理人，归亦都护管辖。战时，他就是这一部落或地区的军事长官。南部几个绿洲是巨大的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有一些具有发达的手工业的城市，如：用亚麻制作高质量布匹的鲁克沁，重要的贸易和文化中心高昌，雅尔等。栽种粮食作物和水果的主要农业区也在天山南部和东部。

官制大概情况如下：亦都护是国家元

究的对象从政治行为者在狭小范围中的控制性策略转向对政治行为者的活动环境所作的进一步的解释。这就为地域性的、全国性的和区间性的调查研究打开了方便之门，借以补充那些早已开始的对地区层次上的政治生活所作的调查研究。这种研究领域的扩大已经促进了田野分析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促进了一种分析单位的使用。这种单位不仅是以局部个人间的互动为基础，而且以这样一些行为和事业为基础，它们能否达到目的要取决于跨越空间和需要大量时间的操作过程。政治情景和政治冲突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

政治人类行为理论的特点，而目前它们已经和对现代世界体系中所产生的统治关系和剥削关系的关注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今后的趋势必然是对阶级内部和阶级之间的政治行为的相互依赖作出生动的描述。这将导致这个领域在日益变化的环境中，对政治现象进行更长时期的观察和分析。

原作者：〔美〕J·温森特

原 载：美国《人类学年鉴》  
1978年，第7卷 张伟摘译，那日校。



首，接下来是“乌尔奇”（宰相），以下是“图曼耶尔奇”（万人长）或“耶尔奇”，最后是伯克。伯克是国家机关人员最低的一级。他们的职责非常广泛。他们完成上级官员的命令，监督及时缴纳各种捐税，服劳役，保障供给耶尔奇和其他官员用的马匹。村长们（巴什利亚姆耶尔布敦）归伯克管辖，是伯克下达的各种命令的直接执行者。在回鹘臣服于蒙古人以后，出现了达鲁花赤。达鲁花赤的权利和义务很广泛，他隶属于亦都护，管理城镇，照管税收等。亦都护把国家看成是应该由他本人及其亲属管理的世袭领地，他的亲属在管理国家方面起着不小的作用。这是游牧民族氏族部落习俗的残余。

回鹘王国的对外关系不都是带有和平性质。回鹘不得不同西夏进行长期战争。年轻、好战和强大的西夏帝国实行积极的对外政策，它曾同四周的民族和回鹘作战。回鹘由于内部的封建割据而不能给西夏以有力的抵抗。到1028年，甘州、凉州被侵占，1036年西夏征服了肃州和沙州（敦煌），一部分回鹘西逃，留下的降服于西夏。西夏领土到

达哈密。回鹘汗们同中国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他们的使者常到中国。中国皇帝也派人出使回鹘，很有名的一次是981年王延德出使阿斯兰汗的行动。不仅党项人从东面，而且黑汗王朝从西面也在向回鹘王国施加军事压力。信伊斯兰教的黑汗王朝认为同异教徒回鹘亦都护们的战争是神圣的。但是他们向东方的军事远征和领土扩张并没有成功。1125年后，契丹人由于被女真打败而西迁，并征服了黑汗王朝。回鹘亦都护承认自己是契丹人的附庸，于是西边的军事冲突就停止了。

对契丹（西辽）的从属关系一直保持到1209年，契丹驻哈拉火州的代表被杀的时候。回鹘亦都护害怕契丹人报复，就投靠了蒙古草原上的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则将自己的女儿阿勒屯许给了他。以后，高昌回鹘王国就逐渐变成了蒙古汗国的一部分，而这一变化是和平地完成的。

原著者（苏）吉洪诺夫

原译者：姬增禄

杨圣敏摘自《西北历史资料》1983年2期

## 在苏州举行学术座谈会 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

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于5月11日至15日在江苏苏州市召开了一次学术座谈会。

会议收到学术论文30篇，内容涉及史地，宗教，占文献，关于民族关系，文化传播，还有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等等。

中亚文化研究协会理事长陈翰笙先生对今后中亚研究提出七个研究方向：（1）中亚各地的民族问题；（2）中亚各地的政治体系；（3）中亚各地的社会等级制度；（4）中亚各地的奴隶制度；（5）马匹在中亚政治经济中的作用；（6）中亚各地农牧业的发展；（7）中亚各地统治阶级的纷争。

穆舜英先生谈了协会秘书处今后的工作计划：（1）继续办好学会通讯；（2）继续编撰出版《中亚学刊》；（3）酝酿成立新疆中亚研究学会；（4）组织力量编写中亚文化小丛书；（5）组织下届年会的筹备工作。

供稿：何庸



# 对待语言和语言集团的态度

一个为社会语言学家所广泛接受的观点就是，语言不仅仅是交际的工具，同时也是社会认同性和集团认同性的符号，是集团成员资格和一致性的标志。豪根（Haugen）曾这样写道，语言“既象社团的法律、宗教和经济一样是一种社会的制度，同时又是协调其他社会制度，使它们得以发挥作用的一种社会工具。”

既作为交际工具、又作为集团认同性符号的语言，总是伴随着不单单是语言使用者，而且还有不了解这种语言的人对它的态度和评价的。然而，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看到，对待某种语言的态度——是否优美，是否功效大，是否发达等等——常常与对待这种语言使用者的态度混为一谈。

在一个不同集团共存的社团里，语言态度在这些语言使用者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豪根写道：“无论语言在哪儿发生接触，都能发现人们对这些语言的赞誉或毁誉的流行的态度。这些态度可以对语言的使用者和语言的使用产生深刻的影响。归根到底，这些态度是针对着语言使用者的，因而这些态度也就成为语言集团之间的评价和成见。”

## 一、对待语言集团的态度

大量的调查说明了，当其中的一个语言集团在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数量上占优势的时候，在两个语言集团的内部和两个语言集团之间所存在的各种态度的类型。语言多数集团对没有权力和威望的语言集团的否定态度，被这个集团部分地或整体地接受，

以至于常常达到这样的程度，语言少数集团的成员对自己的贬低甚至超过多数集团成员对他们的贬低。结果出人意料的，多数集团对少数集团的态度有时比少数集团对自己本身的态度更为积极。

在大多数研究中令人感兴趣的是双语判断者经常与单语判断者的反应不同，前者对两个语言集团的态度差别是很小的。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双语制总是减少多数集团与少数集团之间的态度差别，那将是错误的。实际上有许多的例证，象如在少数民族受压迫和大民族主义盛行的国家里，双语人的判断反应出两个语言集团的态度，即对少数集团的否定和对多数集团的赞同。然而这却是事实，双语人比之少数集团的单语人既不对少数集团过低地诋毁，也不对多数集团过高地赞同。

## 二、对待语言的态度

无论何时两种语言一经接触，其中的一种往往被认为比另一种更有威望。几乎在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里，人们都能找到语言没有同等威望的例证。虽然在少数社团里，当两种或更多的正在发生接触的语言同属世界性的语言（象英语和法语，或西班牙语和德语）的时候，人们对待这些语言的态度可能是同样积极的；但是在大多数语言接触环境中，其中的一种语言往往被认为是比较有威望的。

双语或单语国家里的少数民族的语言经常是多数集团所攻击的对象。一种最通常的

（下转第12页）



---

# 越南少数民族的双语制度

## 影响普及的诸因素

---

M·H·古勃戈洛(苏)《苏联民族学》1986年第一期发表研究文章,论及越南少数民族的双语制度问题。作者根据近年来具体的民族社会学调查材料,比较全面地研究了越南境内少数民族的双语现象。研究对象主要包括岱依人、侬人、泰人、墨农人和京人。

论文作者把双语习得途径(仅就越南境内的少数民族而言)分为两种:传统途径(交际途径)和现代途径(学校途径)。

上述两种途径之间的关系随着时代的不同,随着人们的辈份不同而变化,同时,民族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

所谓的传统途径,就是少数民族在家庭内外日常生活交往中对第二种(非本族的)语言的习得,当然是这种语言的口语形式的掌握;所谓现代途径,就是少数民族在学校里对第二种(非本族的)语言的习得,亦即对这种语言的书面形式的掌握。

总的说来,历史上的越南少数民族成员主要通过传统途径学习第二种语言,而现代的越南少数民族成员则主要通过现代途径学习第二种语言。当然,作者认为,这两种途径并非彼此对立,而是互相补充的。

这里必须说明,这篇论文所谓的“第二种语言”指的就是越语。作者认为越语是越南各民族之间的共同交际语,越南少数民族有权力也有义务去掌握这个第二种语言——越语,同时,学习和掌握越语也是越南诸少数民族发自内心的呼声,也是现在和将来越南语言形势发展的主流。

作者认为,双语的习得,至少在越南境内,与异族通婚无关;越南少数民族对于双语的习得是出自“再生性”,即前一辈的人已经具备了双语能力,然后自然传递给下一代,这种再生性是家庭内部的,而不是外部的。

作者把越南少数民族成员分成三个年龄组:18—29岁为一组,30—49岁为一组,50岁以上为另一组。从第三组到第一组明显表现出学习第二种语言的传统途径向现代途径的过渡,即老年人多通过民间交往的传统途径学习越语,年青人则多通过学校教育的现代途径学习越语,中年人则是二者间的过渡。

作者把影响越南少数民族学习越语的因素,大体上分为家庭因素、工作因素、居住区交往因素、军队服役因素,(以上为传统因素);一般学校因素、技校因素和大学因素(以上为学校因素)。在这些因素中,家庭因素和一般学校(中学)因素各为两组因素中比重最大的因素。

作者把六个表格组织到论文中作为实证。这六个表格都是根据民族社会学调查材料制

成，它们分别是：表格1——越南北部省份少数民族中影响越语普及的基本因素；表格2——越南北部省份中非越人民族家庭的民族构成；表格3——越南北部省份少数民族中不同年龄组的教育水准；表格4——越南北部省份少数民族中不同年龄组中影响掌握越语的因素；表格5——越南北部省份中学校、教师和学生的数字变化；表格6——越南北部省份少数民族对于掌握第二种语言（越语）的认识。

其中表格6被作者用来证明，越南少数民族学习越语的主要目的是进行交际和提高文化水平，有部分人是为了找工作和提高物质福利以及满足某种情感需求（比如结交新的朋友）。

总之，这篇论文对于我们研究少数民族的双语现象是有参考价值的，尽管它的政治色彩过浓。

供稿：纳 日

（上接第10页）

手段就是把少数民族的语言叫作方言或土语，然后把非语言学家对方言的诋毁不断地施加到少数民族的语言上，说它的词汇不如标准语丰富，缺少语言规则，语调粗俗，没有优雅的表达方式。虽然这些语言态度是出自多数集团的，但是它们逐渐被少数民族所接受，以至于到后来，少数民族的成员也认为他们说的是一种“贫乏”的语言了。

对待某种语言的态度从否定到肯定的转变，可能是因为政府对这种语言予以正式承认（如巴拉圭的瓜拉尼语，秘鲁的克丘亚语），因为一个国家的独立（如坦桑尼亚的斯瓦西利语），因为加强了自治（如魁北克的加拿大法语，西班牙的加泰隆语），也因为民权运动（如美国的土著语言或移民语言），甚至还因为社会科学家和语言学家的努力（如美国和法国的聋人手势语）。但是，由于人们固有的种族主义，世界上众多的少数民族语言将继续受到歧视。

### 三、语言态度的影响

对待某种语言的否定或肯定的态度，都能对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产生深刻的影响。首先影响到语言的学习。在语言接触中，一种语言占优势一般是由这种语言的使用者所决

定的。多数人的或占优势的语言既为多数集团的成员所掌握，也为少数集团的成员所掌握；而少数人的语言则仅为少数集团的成员所掌握。语言态度也影响到第一语言的学习。父母帮助子女学习占优势的语言，为了在将来的生活中不受歧视，为了提高社会地位，这种现象普遍增多。对待某种语言的否定态度还能影响它的日常使用，例如说这种语言的人可能会拒绝在公共场合里使用它。但是，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歧视也能产生相反的结果，即增强了语言集团成员的团结和对自己语言的忠诚。尽管使用一种受歧视的语言的人们可能是一个没有威望的集团，但是至少在少数民族看来这可以增强这个集团的积极价值，并且象征着集团成员的团结一致。

总之，语言态度始终是事关双语人学习哪种语言、使用哪种语言、选择哪种语言的一个主要的因素。

原作者：〔美〕F·格劳斯金

原 载：《双语生活》

张 伟 摘译



# 尼夫赫人族源问题

尼夫赫人（即清代文献中的费雅喀族——译注）是居住在库页岛和黑龙江下游一些地区的一个不大的民族。

П·И·什连克把尼夫赫人归入古亚细亚民族群，这个民族群最初是由他从历史地理角度划分出来的。他推测，尼夫赫人过去曾经居住在亚洲的广大地区，后来，由于受到更强大的民族压力，他们被迫收缩，甚至从大陆迁往库页岛。什连克认为，有一些尼夫赫人之所以从库页岛返回大陆，是因为爱奴人受日本人排挤，由库页岛南部向北部移动引起的。

斯特忍堡则认为，目前尼夫赫人在大陆占据的地区不能认为是他最早居住的地域，因为尼夫赫人是从靠近北极地带的更北地区迁到这里来的。他认为，尼夫赫人生活的某些典型特点是“极地”特点，这便是证明。斯特忍堡还提出一个尼夫赫人同美洲印第安人在族源上有联系的假说。他认为，这种相似之处存在于亲属制、婚制、氏族结构和神话故事之中。而说明尼夫赫人同美洲印第安人具有亲属关系的主要论据，则是“基立亚克语和许多美洲语具有相近的共同语言结构”。

大多数考察家（佐洛塔列夫、列文、奥克拉德尼科夫、杰列维扬科、瓦西列夫斯基等）都坚持当地起源说。

尼夫赫人的起源问题和这一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正在引起考古学家、语言学家、民族学家和其他专家们的注意，因为这些问题

的解决同研究太平洋亚洲沿岸古代居民的文化 and 黑龙江下游流域与库页岛上当地部落的形成密切相关。

人种学科学证实，尼夫赫人身上具有南方特点，同时又指出，在朝鲜人和满州人的人种类型中，存在着使他们同北方蒙古人种，首先是同黑龙江居民多少接近的“北方影响”的某些特点。但是，也有可能，这是黑龙江与邻近的南部各地区在古代相互联系的结果。

考古学与民族学材料使我们可以作出结论：在族源学方面，尼夫赫人文化保留了同在黑龙江下游发现的青铜文化的联系。

苏联学者在尼夫赫人族源方面的最新的语言学考察很有意义。尼夫赫语同包括朝鲜语在内的阿尔泰语系诸语种具有某些在类型和材料上相似的特点。

根据历史资料，同掌握了捕鱼文化的黑龙江下游和库页岛其它居民一样，尼夫赫人也包括在“衣鱼皮的民族”、“鱼皮鞣子”概念之内。

现代尼夫赫人祖先的文化是在同散布于鄂霍次克海沿岸、中亚和东南亚的各民族的文化接触中发展起来的。

由于这个缘故，尼夫赫人的民族面貌自然发生了变化，但是他们仍然保留了渔民和捕海兽人独特文化的基本特点。因此，有理由认为，尼夫赫人是黑龙江下游流域和库页岛的古代新石器时期文化的继承者。可以认

（下转第17页）



突

厥

语

文

按照较古老的理论，突厥诸语言属于乌拉尔-阿尔泰语系，比较近期的理论提出：按照有亲缘关系的“语言”的等级排列，则有下列一些语言：印欧语、乌拉尔语、突厥语、蒙古语，通古斯-满语及朝鲜语。

根据（浊辅音等）语音标准，现代突厥诸语言被区分为西突厥语（楚瓦什语）和东突厥语（土尔克(turki)语、乌古斯语、克普恰克突厥语、萨彦突厥语、雅库特语）诸语言。东突厥语的方言有：和田语、撒拉语、裕固语、维吾尔语、乌孜别克语(以上为土耳其诸语言)；阿夏恰里语(Aghacheri)、阿伍沙尔语(Avshar)、阿塞尔语(Azeri)、嘎嘎乌孜语(Gagauz)、贡都孜律语(Gündüzlü)、卡亚尔语(Kajar)卡拉卡尔帕克语、喀什凯语(Kashkay)、卡拉依语(Khalaj)、卡姆斯语(Khamse)、萨里楚克语(salchuk)、土耳其语、土库曼语(以上为乌古斯突厥语诸方言)；巴勒卡尔语(Balkar)、巴什基尔语、克里米亚语(Crimean)、卡瑞姆语(Koraim)、卡拉卡尔帕克语、卡拉恰依语(Karachay)、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库慕克语、诺盖语、鄂毕河流域突厥语有四个次方言、塔甫塔尔语(Tepter)、伏尔加河流域突厥语有六个次方言(以上是克普恰克突厥语诸方言)；阿巴坎(Abakan)突厥语有六个次方言，巴拉巴语(Baraba)、乔里木(Cholim)语有三个次方言、卡拉哈斯语(Karaghas)、莫依拉特语有六个次方言、绍尔语、图瓦语(以上是萨彦突厥语诸方言)。

过去突厥诸语言的口语在不同的突厥地区(无论是纯种族的、还是混合种族的或者是殖民地的)都能以相同的方法组成。西突厥语是各种乌古尔(Oghur)突厥人和布加尔人的语言。东突厥语，即土尔克突厥诸方言曾经是兰(kök)突厥人(译注：所谓 kök突厥人即鄂尔浑河突厥文碑铭语言的操用者)、回鹘人、葛逻禄人、察合台人、铁木耳人、中亚汗国(希瓦、布哈拉、费尔干纳)的居民、中国新疆地区和印度河流域时期(例如：仅仅是一直被提及的莫戈勒(Moghul)人)的口语。乌古斯突厥语是塞尔柱(Seljuk)、伊力卡尼德(ilkhanid)、萨法乌德(Safavid)和奥托曼地区或朝代的语言。克普恰克突厥语曾是柯尔克孜人、卡扎尔(Kazar)人、贝琴涅戈人、库曼人、金帐汗国人和欧亚王朝(克里米亚人、欧洲汗国、喀山人、卡斯木人、西伯利亚人)和麦木里克(Memeluk)人的语言。更早一些的萨彦突厥语和雅库特语留存甚少，以至难以对它们发表什么意见。与此相类似的，一些不一致的突厥民族的语言材料(如：匈奴人、萨比尔Sabir人、阿瓦尔Avar人等更多的是前兰突厥时期)由于非常含混，以致其分类一直没有确定。

今天至少有六千五百万人把突厥语当作他们的母语一样使用。有四千万人操乌古斯突厥语、一千二百万人操克普恰克突厥语、一千万人操土尔克突厥语。



突厥诸语言一般都是古老的语言。除了楚瓦什语和雅库特语以外，它们彼此有着密切的关系。土尔克语、乌古斯语、克普恰克语以及萨彦突厥语之间的亲缘关系跟德语（或者阿拉伯语）的诸方言之间的关系很相似。突厥诸语言是以其模式的规则性和清晰的结构为特点的。因此它们很象一种科学图案的产品。突厥诸语言的最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元音和谐。就形态学而言，突厥语是粘着语，而且在构词和构形后缀方面有着极其丰富的变化。动词词干可以派生成静词，静词词干能派生成动词。在词形变化中，动词的各种体词形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各种时态是由不同的分词组成的。人称词尾、连接性后缀或者领属性人称后缀原来都是人称代词。突厥语的一个特点就是分词和动名词结构的用法很丰富。因此一些长句，可以不用连词或者不用主从句就可以组成。词序与英语正相反。在突厥语的一个句子里，最后的部分一般是带有各种修饰语的宾语居前的人称谓语。象英语里渗入了法语成分一样，突厥语词汇中渗入了许多阿拉伯和波斯语的成分。

在突厥人的历史行程中，曾经使用过多种文字。最古老的是兰突厥文，它是突厥游牧时期第一种通用的文字，这种文字给我们记录下来了有关黠戛斯人（6世纪）、兰突厥人和贝罕涅戈人的情况。这种文字也曾被乌拉尔匈牙利人采用过。早期被各种突厥人使用过的其他文字有回鹘文（后来被蒙古人和满族人所借用）、粟特文、摩尼文和波罗米文，后来各种突厥人由于密切地接触了伊斯兰教（9世纪），所以阿拉伯文就成了突厥世界里使用最广泛的一种文字。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种文字（在苏联和土耳其）大多为拉丁字母所取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居住在苏联境内的突厥人被迫放弃了拉丁字母而采用了基里尔文字母（译注：这种文字是公元九世纪时由传教士基里尔在楷书希腊字母的基础上创制的，是现代俄语等斯拉夫语族语言所用文字的本源）。

土耳其文学是突厥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突厥人的文学被区分为早期文学（公元8世纪至19世纪）和现代文学（公元19至20世纪）。在早期它们已经形成了一个严谨的整体。在共同的发展过程中，它们在题材、表述方式（体裁及韵律的形式）等方面都是相同的。简而言之，早期的突厥文学必须被看作是一个整体。在现代，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的程度逐渐减弱，其中的一部分已向新的方向发展并走上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

尽管它们在早期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几乎从一开始，书面的突厥文学就已经显示出语言学方面的不同，它们发展成三个清晰的语言阶段：察合台语（Chaghatay）、阿塞耳语（Azeri）和奥托曼土耳其语。其中的第一个，也是最古老的一个集中在中亚，第二个集中在外高加索，第三个集中在小亚西亚。察合台文学的再分期是：兰突厥语文（公元8世纪）、回鹘语文（公元8至13世纪）、葛逻禄语文（公元11到13世纪）、前察合台语文（公元13至14世纪）、察合台语文（公元15至16世纪），后察合台语文（公元17至20世纪）、乌孜别克语文（19至20世纪）等。奥托曼土耳其文学包括奥托曼文学（14至19世纪）和土耳其文学（19至20世纪，即现代的）。

早期的：在察合台文学的再分期中，除兰突厥语文和回鹘语文以外，其他都属于伊斯兰文学。与此同时，所有早期的突厥文学都可分为民间文学和高级文学。在民间文学（大部分保留口头形式）中，纯突厥语成分特别强。至于高级文学，则先是接受了汉语和粟特语的强烈影响，后来又接受了更为强烈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影响。在上述三个文学语言中，民间文学在高级文学中所占的比例是有很大差别的。近期才发现，阿塞耳文学在民间文学方面一



直占较大优势,而奥托曼突厥语文虽然也有过比较丰富的民间文学,但奥托曼土耳其语文跟察合台语文一样,在高级文学方面一直占较大的优势。特别是自16世纪以来,阿塞尓文学在这方面已经衰弱了。在民间文学中,通常是诗歌(有重音的韵律、朗诵时常有乐器伴奏)胜过谚语、谜语以及轶事故事和戏剧(orta oyunu,即一种围成圆圈的表演。Karagöi,即影子戏)。韵文史诗或散文(玛纳斯,阔鲁赫鲁等)在民间文学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在高级文学方面应该提及的是诗歌,特别是诗集(Divan)。这里大量的韵律是受了波斯语的强烈影响。而一些著名的书面文学作品大部分是散文,它们明显地受了阿拉伯语的影响。历史著作和书目提要在高级文学中也是重要的项目,而且是整个伊斯兰文坛中最佳的一类。回忆录也值得注目,在伊斯兰文学中,在奥托曼土耳其地理学著作中,西方甚至美国曾得到了首次的描写。

早期的察合台文学中的一些重要著作,有兰突厥语的鄂尔浑碑铭(历史概述,8世纪)和大量的8至13世纪的回鹘文献(主要是摩尼教、景教和佛教内容的译作)。葛逻禄时期有(公元1069年)巴拉撒衮的玉素甫作的一部劝戒性长诗《福乐智慧》(Kutadghu Bilig);1077年喀什噶尔的玛合穆提编纂的一部比较词书《突厥语词典》(Divan-i Lughat-it-Turk)和公元1166年由耶斯(Yesi)的阿合买提编著的民间神话诗集《狄万希克梅特》(Diuan-i Hikmet)等是很重要的著作。察合台时期(13至20世纪)的作品,如14世纪拉伯古孜的圣徒传《先知的传说》(Kisas-ul-enbiya);阿里·西尔(公元1501年)创作的文学作品总集《穆哈克美特——乌尔——鲁哈提》(MuhaKemet-ul-lughateyn);巴布尔(公元1530年)创作的传记《巴布尔回忆录》(Vekayi-i Babur);艾布里哈孜(公元1663年)创作的史书《耶里·塔拉克默》(Shejri-i Terakime)等等。阿里·西尔和巴布尔是察哈台文学上的卓越人物。

在阿塞尓突厥文学中,14世纪的叙事诗《狄笛·柯尔库特》(Dede Korkut);尼斯米(公元1403年)的神话诗集《狄万》(Divan);和傅祖理(公元1555年)的诗集《狄万》(Divan)也值得注意。其中主要的人物毫无疑问地是傅祖理。

在奥托曼土耳其文学中,我们可以见到纳斯尔丁·霍加(公元1284?年)的故事集《希卡耶拉尔》(hikayeler);尤努斯·艾木里(1320?年)的民间故事诗《狄万》(Divan);苏来依曼·切里比(公元1442年)的宗教诗《买乌鲁特》(Mevlut);巴克(公元1600年)的诗歌集《狄万》;卑丘依(公元1650年)的历史著作《历史》(Tarih);卡提甫·切里比(公元1655年)的书目提要《克斯甫·乌孜·祖农》(Keshf-uz-zunun);依乌利亚(公元1682年)创作的游记《瑟亚哈特纳默》(Seyahatname);尼狄姆(公元1730年)的诗集《狄万》。在这样丰富的文学作品中,要把其中的哪一个作为最伟大的人物提出来,是不可能的。

现代的:这一时期的突厥文学的种类更多,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学语言,并且承认与靠拢“三个老语言”。这一时期的突厥文学已显示出西方的强烈影响。在与檀兹玛特(Tanzimat)文学同时开始于19世纪的土耳其文学中,短篇故事占优势,诗歌与一些名著也很出色。沙皇时期的阿塞尓文学在戏剧方面是特别突出的。甚至一直到今天,阿塞尓人阿康扎德都被看成是突厥世界和近中东最伟大的剧作家。

靳尚怡摘译自T·哈刺斯昆《土耳其语语法》英译本《前言》



# 突厥语分类问题

突厥语分类问题是没有完全解决的突厥学问题之一。虽然有许多的分类尝试，但至今没有一个能够被认为是完全成功的。

所有现有的分类法的基本缺陷——作者力求一定包括所有突厥语——现代的、古代的和它们的方言。然而分类法应建立在一个原则上——共时性或历时性原则上。可这些作者却同时考虑到两个。所以很清楚，在现代的突厥语言分类中不应该包括那些古代的书面语言在内，象鄂尔浑碑铭语言、古代维吾尔语和克普恰克语。

现有的分类法还有一个共同的缺陷是，虽然具有稳固的语音学标准，但在分类法里它们却不完全连贯。

第三个缺陷是，在他们的分类法中没有为撒拉语找到自己的位置。按波普的看法（《撒拉语简况》），撒拉语是维吾尔语新的方

言。德林巴（ЛРимба）（《关于撒拉语的分类》）则作出结论：撒拉语是独立的语言，与新的维吾尔语归为一组。按我们的看法，撒拉语是察哈台语组独特的一种语言。

最后，不久前为众人所知的哈拉吉语（Халаджский язык）具有区别特征，并要求将其纳入分类法的一览表。在这里，象在土瓦语中一样，保存了古突厥语的音位 d。但是，哈拉吉语不可能与土瓦语一组，因为它保留了由 p 音位发展而来的词首 h 音位。

上面所叙述的一切再一次证实了制订新的突厥语分类法代替已有分类法的必要性。

原作者：Т. 铁肯

苑焯译自《ПРОБЛЕМЫ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ТЮР  
КОЛОГИИ》，АЛМА-  
АТА，1980，387-389。

（上接第13页）

为，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这一民族正是在这里形成的。确实，现代尼夫赫人的文化反映了它同黑龙江下游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文化的不容怀疑的联系。同时，尼夫赫人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许多成分都同在太平洋沿岸北部另一些民族那里发现的某些文化成分相类似。完全可能，这种民族历史上的一致性也曾扩展到更为广泛的领域。就现有的知识水平而言，这些假说正在

产生一系列问题，要求作进一步研究，积累新的事实材料。

原著者：Ч. М. 塔克萨米

抄编自 吉林社科院苏联室郭燕  
顺、孙运来编译《民族  
译文集》第一辑，孙运  
来译自《北方各民族族  
源学》，莫斯科，1980年。

供稿：纳日碧力戈

## 关于民族志资料的品质问题

香港的李亦园先生在他与另几位作者合著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法》一书中，专辟章节阐述了文化比较问题，其中提出了关于民族志资料品质的评价问题，值得民族学研究人员认真思考。

民族志在广义上包括所有对一个民族或文化的记录。狭义民族志则是指文化人类学家或民族学家对一个民族或文化所做的调查报告。人类学家在研究一个民族时，有很多因素影响他研究成果的水准，即使是最好的人类学家，也免不了犯错误或受主观的影响。受过科学训练的人类学家都免不了会出问题，更不用说那些一般记述，其品质就更有疑问了。文化比较研究必须扩大比较的范围，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民族志资料。由于民族志资料并不都是十分可靠的，它们的品质控制就受到了文化比较研究者们的重视。

许多学者都对民族志资料的品质控制问题发表了见解。美国人类学家拉欧尔·那若尔曾经在《文化比较调查的资料品质控制》一文中，提出了判定某一民族志资料品质优劣的二十五点标准。人们一般认为，下列九点标准为最重要：①调查时间：研究者在田野时间越长，其报告越可靠。②参与观察：实际参与或观察要比访问所得资料可靠。③报告性质：报告个案要比一般陈述可靠。④语言应用：用土语调查所得较经过翻译可靠。⑤作者训练：有训练的科学家比一般记述者可靠。⑥报告内容：报告内容详细不含

糊者为佳。⑦报告长短：报告篇幅较长者通常有较多资料可用。⑧报告发表时间：报告发表与田野工作结束后时间相隔的长短及发表的年代等。⑨土著助手的人数与他们承担工作的性质。

那若尔先生曾对民族志资料中的上述各种品质因素做过测定，以了解其可靠性。他的研究证明，对于不同的社会行为来说，上述各种品质因素的重要性是不同的。例如，如果评价抗议性的自杀这种文化压力所产生的异常行为在民族志资料中记录的品质如何，与该资料内容是否详细关系甚为重要。关于巫术的情况调查时间越长，报告个案越多，土著语言运用越纯熟，其民族志资料的品质就越优。若研究民族的宗教、习俗和禁忌等各种现象、行为，当我们利用了多种来源的不同资料并遇到了某些分歧之时，在研究者本人无法重新调查核实的情形下，运用民族学资料的品质判断方法，择出较可靠的资料加以利用，无疑会推动我们的研究。进行文化比较研究时，这种品质判断方法更会经常为人们所用。

在收集、保存有关民族志资料时，如果能将该报告的各种品质因素列入档案之中，供研究者判断之用，那就会更好地利用这些民族学资料。

原载：〔香港〕杨国枢、李亦园等著  
《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法》

鼎夫 摘编



## 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的热潮正在兴起

近几年来,我国知识界对中外文化比较研究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争论越来越激烈,讨论所涉及的面也越来越广。甚至许多海外学者也卷入了进来。不少人认为,这是继五四运动以后的又一次文化讨论热潮。有人还认为这种讨论是中国文明第三期兴起的希望。

讨论的中心议题主要集中在两大问题上:第一,如何估价中国的传统文化?第二,如何对待学习西方文化?

对第一个问题,有好多种说法,但主要不外于两种态度,一种态度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非常优秀,比之西方文化有更多的优越性,将来世界现代化的趋势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加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文化发生过许多重要的影响,今后的影响还会更大。因此,应该保持中国的传统文化,并加以发扬光大。持此种看法的学者以海外和台湾学者的人数为多。

另一种态度则与之相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和惰心很大,起了束缚中国人民思想的作用,是中国社会历史进步的障碍,因而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障碍。因此,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象五四时期那样彻底批判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所起的坏作用,也就是说,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彻底的反思(或反省)。

对第二个问题也有好多种说法,但基本上也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说法认为,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两种文化模式,各有各的特点,不能把西方文化硬搬到中国来。现代化不等于西

化,五四运动就是因为过分强调了西化,因而客观上“切断”了中国的文化传统,造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断裂带”,使今天的文化成了大杂烩文化。如果一定要学习西方文化的话,那也应该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从而充实中国文化。

另一类说法则认为,西方的文化总的来说比我们高,这是客观事实。我们应该尊重客观事实,看到我们传统文化的落后性和消极性。要进步,就要向先进学习,要搞现代化就得学习西方文化。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也是一次学习西方的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是一次大冲击,这种冲击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起了巨大的作用。遗憾的是五四运动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否定由于各种原因而中断了,没有继续深入下去,现在是继续深入下去的时候了。这类意见还认为,搞现代化光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还不行,现代化不能只限于科学技术层面,更重要的是文化深层的现代化,其中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现代化和对我们文化历史的反思。只提科学技术现代化,不提文化现代化和人的思想现代化,实现现代化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四个现代化的实质是文化现代化。我们不应该排斥外来文化,而应该敢于迎接外来文化,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从而造就和发展我们的新文化。他们还认为前面那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的意见,实际上还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有人甚至还针锋相对地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口号。



目前,国内的一些报刊和杂志上已陆续地刊载了一些有关文化比较研究的文章。如《光明日报》1986年1月6日的“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和17日的“从印度佛教的传入看中国文化的发展”;《读书》杂志1986年第一期和第二期上的几篇文章:“文化、寻根、语码”、“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反省”、“文化性格的裂变与更新”、“文化角度”、“传统、时间性与未来”等;《社会科学》杂志1985年1—12期上的几篇文章:“东西文化比较研究全国讨论会综述”、“中国文化讲习班对中国文化的看法”、“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兴起”等;《社会》杂志1985年第6期的“纵论海派”、“文化融合断想”等;《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一期的“关于东西文化比较的随想”等等。

文化比较研究的讨论,已引起了国家领导部门的重视和关心。文化部今年元月份与《光明日报》社联合召开了“文化发展战略座谈会”,会后把一些学术界著名人士如钱学森、朱穆之、于光远、庞朴、严家其、陈丹

晨等人的发言刊载在1986年1月13日和17日的《光明日报》上。

上海是目前全国讨论文化比较研究问题最活跃的地方。1984年在上海举行了全国东西文化比较研究会议,1985年又在上海举行了国际文化会议。上海的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还联合成立了上海东西文化比较研究中心”。其他省市也有不少人投入到这一讨论中去。去年10月29日到11月2日在深圳召开了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并成立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北京的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也投入了比较文化研究讨论的热潮中。北大哲学系、社会科学院、人民大学等有不少学者对这个问题公开发表了意见。北大哲学系、九州知识信息中心和中国文化书院去年2月和今年元月还举办了两次讲习班,第一次是“中国文化讲习班”,第二次是“中外比较文化讲习班”,其中第二次讲习班全国闻讯来参加者达千人之多。据悉,清华大学和人民大学准备在近期成立相应的机构或组织来研究文化比较问题。 供稿:王庆仁

(上接第22页) (《台湾研究集刊》1985年第2期)一文认为,平埔人土地私有代替公有,虽然清初已经发生,但它的发展过程大约经过一个多世纪,到道光年间才确立。在这之前,平埔人始终并存着公有地和私有地,并且以公有地为主的土地所有制形式。郭志超的《清代汉族影响下的高山族农业技术之变革》(《台湾研究集刊》1985年第1期)一文,则对汉族在农业技术方面影响高山族的若干途径进行了剖析。

#### (八) 其他方面的研究。

文章还谈到学界对“台湾”名称由来的一些看法。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考释大致有三种不同意见:一是起源于荷兰人修筑楼台于海水入处所致;二是由“大湾”一名

转化而来;三是由明朝中叶前,原安平地方(指今台南一带)的土著民族台窝湾族的发音转化而来。邵泰的《关于台湾名称的由来》(《历史研究》1982年第2期)一文认为,前两说皆牵强附会,是站不住脚的。作者持第三种意见,认为中国文献记载(包括郑舜功《日本一鉴》称“大惠”)所称“大员”、“舌员”、“大湾”等均根据当地居民的发音记录下来的;荷兰文献所写,Tayovan(台窝湾)、Tyovon(梯窝湾)、Teijoan(大员)、Toyuan(台员)等,也是根据当地居民的发音记录下来的。“台湾”名称源于安平一带台窝湾族,经过习惯的演变而约定俗成,又由官府正式命名而转化为全岛之称。 供稿:许民国



# 台 湾 人 类 学 界 简 况

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人类学与社会学和心理学一起，构成行为科学的三个核心学科。但台湾的人类学研究与其他两个学科相比，尚不甚发达。

台湾的人类学发源于大陆。大陆的人类学可以说开始于1930年左右。那时，国内人类学有南北两派。南派以中央研究院为代表，北派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代表。燕京大学的人类学倾向于研究一般的社会科学，而中央研究院的学者则专在人文科学上下功夫。现在台湾的人类学，主要承袭了中央研究院的传统。

中央研究院迁台后，在台湾大学创建考古人类学系，从而把它的传统移到下一代身上。这个学派的特点是不追求规律或原理原则而重创造，重视对文学、技艺和其他方面的研究。

现在台湾的人类学在院校里只有一个半系，这就是台大的考古人类学系与政大的民族社会学系。后者是民族学与社会学合在一起，所以只能算半个系在研究人类学。在研究机构方面，实际上也只有一个半，即中央研究院的民族学研究所与历史语言研究所。后者只有一部份研究人类学。

在出版物方面，有三种专门的学术刊物：

一、台湾大学的考古人类学刊，现在出

到第三十二期。这是纯粹的人类学刊物，却不是纯粹的文化人类学刊物。其中还有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等。从学科支柱上讲，文化人类学只是人类学的四分之一。

二、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这可说是较纯粹的文化人类学刊物。

三、中国民族学会学报。这刊物只出了三期，后来就改成了通讯，但陆续还有一些关于人类学的文章。

此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政大的边政学报、边政年报等也间或发表一些文化人类学的文章。

原作者：李亦园

据李亦园著《人类学与现代  
社会》(水牛图书出版事业  
有限公司1984年7月版)



# 关于高山族研究

许良国在即将发表的《近年来台湾地方史研究概述》一文中谈到近年来关于高山族研究情况。文章说，施联珠编著的《台湾史略》以翔实的史料，并吸收新近的考古发掘和科研成果，在较全面介绍了台湾历史的同时，介绍了高山族聚居情况。陈碧笙著的《台湾地方史》采摭广博，依据地质学、古生物学、民族学和人类学材料，对台湾民族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认为台湾土著民族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陈国强撰著的《郑成功与高山族》是近年来继《高山族简史》之后又一本研究高山族的著作，书中对高山族研究中的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使读者耳目一新。

文章回顾了近年来关于高山族研究涉及的几个方面。

关于族源。史学界对高山族的来源问题历来众说纷纭，主要有：土著居民说；南来说，即认为来源于菲律宾、婆罗洲诸群岛的马来人；西来说，又称大陆说，认为台湾高山族来自大陆古越人的一支。施联珠在《高山族族源考略》（《民族研究》1982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以上各种说法都失之于片面，大量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证明，高山族除主要来源于祖国大陆的占越人外，还源自琉球群岛、菲律宾群岛等的居民，并融合了不少从大陆迁去的金人和汉人。

关于族称。我国台湾省除汉族以外，占人口2%的少数民族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呢？还是若干个？用“高山族”作他们的统称是否确切，能否改变？这些问题已经引起学术

界重视，并发表了不同意见。许良国的《台湾少数民族名称与族别问题浅议》（《民族学研究》第5辑）一文认为，台湾少数民族并非一个单一的民族。台湾少数民族的来源是多源的，他们进入台湾的时间不一，到达台湾后，又经过不断的迁徙而定居下来，逐步发展成为各个不同的民族。从现实情况看，他们各有其独立的语言文化，政治上各不相属，社会发展也不平衡，因而社会经济文化上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根据他们的语言和文化特点，台湾少数民族除平埔人已基本汉化以外，可以划一确定为九族，即：泰雅、赛夏、布农、曹、鲁凯、排湾、卑南、阿美、雅美。作者还认为，用高山族作台湾少数民族的统称并不确切。我国历史上从无“高山族”这一称法。这一称法的由来，与日本的侵台活动不无关系。它并不完全符合“名从主人”的原则，不符合台湾少数民族居住的地理特点。

关于“阿眉斯”名称。历来有“自称”“他称”两种不同提法；与此有关的名称的译法也有“阿眉斯”和“阿美”两种说法。曾思奇的《阿眉斯名称沿革及译法浅谈》（《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一文认为，从阿眉斯名称的沿革，以及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阿眉斯”是阿眉人普遍通行的“自称”，也是唯一正确的、合乎规范的汉译名称。

对于台湾高山族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有文章进行了研究。林庆元的《台湾高山族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和确立》（下转第20页）



澎	湖	考	古	概	述
---	---	---	---	---	---

澎湖考古始于1941年。日本国分直一在澎湖本岛（马公岛）良文港发现了两处新石器时代遗址。1945年，台湾、澎湖回归祖国怀抱后，台湾大学地质系、考古人类学系的学者在1952~1979年间，多次到澎湖进行考古调查和试掘，获得了重要成果。

到目前为止，一共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十一处，汉文化遗址七处。这些遗址都是人为的贝冢，散布在澎湖群岛的大小岛屿上。十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计有吉贝（在吉贝岛）、通梁a（在白沙岛）、赤崁、良文港a、良文港b（均在马公岛）、竹篙湾a、竹篙湾b、二崁（均在西屿）、虎井（在虎井岛）、沙港和东安（均未详所在）。台湾学者认为：上述新石器时代遗址同属绳纹红陶文化系统。它的特征是：手制的红褐色陶器上施以粗细不等的绳纹（用掘绑绳索的陶拍拍印上去）其它纹饰比较少见，偶而发现有划纹、堆纹、以及彩色；亦有不少素面者，其上不施任何纹饰。陶器的质地，因火候较低，质地松软，硬度约为二或三度。陶质含沙，但可能不是有意掺进的，而是陶土本身含砂。陶器的器形简单，以鼓腹罐最为常见，口部一般颈厚唇薄。少数陶罐带有圈足。陶钵数量不多。石器有打制石锄、磨制石斧、石锛、石锛和网坠等。在澎湖未发现绳纹红陶文化常有的遗物石礮和石刀。这是生态环境使然。这里不易农业。各遗址出土大量的网坠以及鱼兽骨，显示当时的人类以渔捞为主要生业，兼营狩猎业（捕鹿）绳纹红陶文化距今约四千年左右。台湾本岛台南牛

稠子和网寮遗址出土的陶器，无论在形制、纹饰和质地上，都和澎湖出土的酷似。此外，牛稠子和网寮出土的石器，有不少是用澎湖出产的橄榄石玄武岩制成的。可见，台澎两地当时海上交通必定频繁。牛稠子遗址中层的碳14年代为3,700年，其下层应超过4,000千年。绳纹红陶文化还见于福建闽侯昙石山遗址。

不知什么原因，绳纹红陶文化的人们离开了澎湖。大约二千年的时间内，澎湖地区人迹罕至，未发现有任何人类活动的遗留。所以，目前只发现了宋代汉文化遗址七处：姑婆（在姑婆岛）、后寮（在白沙岛）、中屯a、中屯b（在中屯岛）、通梁b（在白沙岛）、安宅（在马公岛）和布袋（在八罩岛）。在以上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陶瓶、青瓷、青白瓷、白瓷和乌金釉茶盏等。除了中屯a的青花瓷片属于明、清时期，通梁b属早晚混杂的陶瓷外，可以说都属于宋、元时代浙江龙泉窑系和福建泉州窑系烧制的瓷器。其中时代特征最明显的陶瓷器有三件：一是同安青瓷碗：碗深、敛口、口以下弧线内收、小圈足，是南宋流行的器式。二是南宋流行的饮茶器具乌金釉茶盏的残片，釉泥黑色与褐色均有，釉层薄，胎土呈黄或白釉，土质粗。在器形上，足边宽，足心浅，足圈外围有明显的一圈刀修痕迹。据此，判断这是福建窑系的产品。三是陶瓶。这是一种底部略细、肩部稍粗、修腹、小颈、环口式陶器，通高约30公分，口径2~3公分，除口或肩部施以深褐色釉外，其余部分皆不

施釉。这种陶瓶为宋代民间流行的器物。它与福建泉州白沙宋墓及泉州湾挖出的宋船上出土的陶瓶，在“形制上并无二致”。除陶瓷外，还有大量陶质网坠、铁器残片，以及宋代铸造的铜钱：熙宁元宝（宋神宗年号，公元1066~1077年），政和通宝（宋徽宗年号及公元1112、1117年），以及南宋初刘豫建立的伪齐铸造的阜昌通宝（公元1130~1137年）。

这些来自地下的文物，与历史记载——南宋楼钥《攻媿集》卷88《汪大猷行状》关于汪大猷于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遣将分屯”澎湖、赵汝适《诸蕃志》（成书于南宋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关于澎湖隶属于泉

州晋江县的记载，可相互发明。台湾学者认为：从澎湖出土大量宋、元、明时期的瓷片，宋代铜钱等汉人遗物，可以证明至迟在南宋时，汉人已迁移来此。这是汉人开拓澎湖的物证。

为了报道澎湖考古成果，台北《艺术家》杂志第九卷第四期（1979年9月出版）特出“澎湖考古专辑”，发表了十二篇文章，主要有：黄士强《新发现的澎湖新石器时代遗址》谢明良《遗留在澎湖的宋元时期泉州青瓷及龙泉窑青瓷》和陈信雄《来自魂牵梦萦的家乡——澎湖的宋代陶瓶》等。

供稿：张崇根

## 《蒙藏文物特展》简介

一九八三年，在台北市故宫博物院举办了一次为期三个月的《蒙藏文物特展》。此次展出内容有：镀金镶松石珊瑚满达、宗喀巴佛像、铃杵、吡布拉克念珠、奔巴壶等法器；元太祖、太宗、世祖等帝后图像、清谢遂职贡图、无量寿佛、四大天王等佛像；在图书方面有两部甘珠尔经，总五十余种七十余件，有的金碧辉煌，有的具有浓厚的边疆民族色彩。现仅择要简介如次：

**镀金镶松石珊瑚满达** “满达”有人翻译成“满陀罗”，在佛教上象征着卫教护法。展出的镀金镶松石珊瑚满达，呈圆形，高一四点八公分，直径三二点四公分，器物的表面镶着形状不一的孔雀蓝松石，边缘另以松石和珊瑚环绕两道，器身的铜胎镀金腹

围有番莲八宝，转枝花和松石花点缀。这件“满达”是清顺治皇帝在位时，五世达赖喇嘛所贡，供奉于西黄寺。

**宗喀巴佛像** 高五五.二公分，宽三六公分，侧二二.五公分，镀金佛坐像，座及背光分作三部分，造像庄严，眉心嵌珠一粒，双手捏诀，跌坐莲座上；背后饰菩提树为背光，叶上之佛为文殊菩萨，顶端有宝盖，座周壁镌透花狮子，座与背光上均嵌五色珠宝，背光后面刻有汉、满、蒙、藏四体文字。其汉文曰：“乾隆四十六年孟夏日，卫藏贡有大利益金宗喀巴像，奉旨照式范金造此宗喀巴佛，宣扬黄教，普利众生。”

**铃杵** 法器之一，有柄及舌，振之即鸣。此展出之二件铃杵，原供奉于布达拉



宫，为第二辈达赖喇嘛根敦嘉错，第三辈达赖喇嘛索南嘉错，及第五辈达赖喇嘛罗布藏嘉错等所执用。

**吡布拉念珠** 念珠亦名数珠，俗称佛珠，念佛、法、僧三宝时记数之具；吡布拉为梵文之音译，义为颅骨做成，乃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廿七日，第三班禅额尔德尼罗桑贡丹益希，在北京宁寿宫念经时所呈进。

**甘珠尔** 此次所展出之内府泥金藏文写本西藏佛经“甘珠尔”计有两部：一为康熙朝所写。甘珠尔以函为单位，每函经篋主要由书写经文之贝叶和保护经板、经衣等组成。每函贝叶，康熙朝写本约四、五百页；乾隆朝的只有三百余页；叶之大小，前者大于后者，后者叶宽二八.五公分，长八五.五公分，有正、反两面，纸色深蓝，首一、二页为该函之目录，康熙朝只以满藏文对照，而乾隆朝者则为藏、满、蒙、汉四体对照写成；其余贝叶则为经文内容，每面八行，字体为正楷，每个字母约一公分左右。这些贝叶依序叠成后，其边围以泥金绘八宝（法螺、法轮、宝伞、白盖、莲花、宝瓶、

金鱼、盘肠）图案，此除有庄严之作用，并可防止贝叶倒错散乱，盖本函若有几叶颠倒差失，则无法拼成原先的图案。

**清谢遂职贡图卷** 分四卷，图二百七十一，绘世界各国及国内各边疆民族之状貌，各图分绘官民人男妇状貌服饰，图上各有满、汉文标题识语，西藏部分计有五图共十人，绘在第一卷，其完成的时间，据乾隆卷首御题是在二十六年七月，此五图之标题如下：①西藏所属卫、藏、阿里、喀木诸番民②西藏所属补噜克巴番人③西藏所属穆安巴番人④西藏巴塘卡穆等处番人⑤西藏密里雅克番人等。

此次《蒙藏文物特展》之举办，旨在以通俗的方式，将故宫所藏有关蒙古、西藏之文物，公开展示，以增进国人对蒙藏之了解，提高国人对蒙藏之研究兴趣，进而激起国人对蒙藏边疆的重视与爱护。

原作者：钟月丰

原载国立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  
年报》第十四期

乌力吉摘编

（上接第28页）

与新疆各兄弟民族的生活关系比较密切。

我院关也维、张光福两位副教授，也提供了两篇专论，分别对《木卡姆》乐舞的渊源及新疆石窟艺术作了深入的研究。

最后，我想借东方文化史研究的名家常任侠教授为两书所写的《序言》来总结：“现在，由新疆艺术编辑部编辑、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丝绸之路乐舞艺术》和《丝绸之路造型艺术》，集合各专家的研究，对某些专题，多曾经过调查实践，作了很多努力，而且所论述的方面也很丰富，使人得到不少知识，在丝绸之路的艺术研究上，树下一个里程碑，为将来这方面的学术开展，奠定了基础，是值得称道的。”

供稿：陈连开

# 花山崖壁画研究近况

去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了民族、历史、考古、美术、地质、化学等十二个学科的八十多位专家学者考察花山崖壁画。今年元月二十六日，《光明日报》报导了这次考察活动。从报导中可以看出，大家在崖画的族属和年代问题上取得了比较统一的意见，即认为崖画产生的年代上限为战国，下限为东汉，是壮族祖先珍贵的文化遗产。但是，对于作画的目的及社会功用，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所以报导只笼统地说它是“与原始宗教有关，即古时人们为宗教活动而绘制的。”尚未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

这次考察之后，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仍在继续。姜永兴在《广西民族研究》1985年第二期发表文章，不同意“祭河图，拜水神”及“巫术文化的遗迹”二说，其根据是13%的崖壁画远离河边，在陆地的山崖上，与祭河拜水无关。巫术在形式上是依靠幻想中的超自然力量力图影响乃至控制客体（有灵之万物），与崖壁画中表现虔诚的祭祀有悖。他认为“花山崖画是一幅写实性的描绘祭祖盛典的祭祀图，而花山则是壮族先民的祭祖盛地。”但《民族艺术》（试刊号）发表陈明芳的文章仍然坚持“镇水”说。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花山崖壁画的壮族同志认为，三十多年来分别出现过的镇水说、语言符号说、誓师说、庆功说、巫术说、祖先崇拜（即祭祖盛典）说等，都无法自圆其

说，不能令人信服。认为这些观点都脱离了崖壁画产生的社会原因——当时的壮族社会经济生活和由此而产生的意识形态。梁庭望在1982年就曾发表文章，论证了壮族地区出土铜鼓的鼓面青蛙立雕为壮族图腾，这一观点已为广西学术界承认。今年二月，他在《花山之谜——壮族民族守护神的赞歌》一文中指出，花山的人物图象不过是壮族的图腾即民族守护神——蛙神，一些画面则反映了壮族祖先敬祀蛙神的情形。莫俊卿也在去年底广西考察学术讨论会上论证了同一观点。蓝多民对这一观点也表示赞同。有的专家认为，上述论点有可能真正拉开花山之谜的帷幕。

一、花山崖壁画上的人物图象（特别是佩刀的大人物图象）是神而不是人，理由是（1）只有强烈的心理需要、精神欲望——敬神，才有可能促使壮族先民冒着巨大的风险，不惜花费很大的人力物力，到遮檐式的白崖上去画这些供人崇奉的图象。（2）这些图象是如此的庄重、冷峻、威严、虚幻、神秘，平涂的画法，尤其增添诡秘神圣的气氛。（3）作画时间前后相距数百年，崖画绵延二百多公里，但图象却惊人地统一，人物形象程式化、规则化、固定化，说明这个形象不是一般的神，而是上下几百年里、方圆几百里的人们在观念中形成的一个统一的形象，一个高于一般神的民族守护神。



二、花山崖壁画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人们还只有原始的思维。这时的人认为万物有灵，因而人神不分。所以这时的神的形象一般是半人半兽。花山崖壁画的图象其形态明显地是人身蛙形，被壮族舞蹈家称为蛙形舞姿。因此可以断定这个神是蛙神。

三、蛙神具有民族守护神的各种特征。

第一，它所代表的农业经济在崖壁画产生年代已成为壮族的主要经济生活，地下发掘出来的战国时期大量铜制农具即是明证。

第二，凡民族守护神必和上天主宰者有这样那样的密切关系。例如龙代表天威：古希腊守护神阿波罗是上天主宰宙斯的儿子。同样，壮人认为上天主宰者是雷公，蛙神是它的儿子，被作为父王的使者派到人间。

第三，蛙神已经历了从部落图腾上升为民族守护神的历程。蛙本是瓯部落的图腾。据初步研究，瓯是壮语蛙的汉字记音，故瓯骆意思是山沟里的蛙部落。三千五百多年前，瓯向商王朝进贡时，其名字尚与壮族先民桂、损子、临尘等部平行。到了秦瓯战争时（公元前217年），她已统一各部，成为部落联盟中的核心和代表。其图腾也自然上升为全民族图腾，演化成民族守护神。这个过程与原始夏部落图腾蛇，由于黄帝败共工，杀蚩尤，统一中原，黄河流域各部，从而上升为全汉族供奉的龙，是一样的。

第四，在壮人的观念和民间传说里，认为它可以保佑壮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因为它能呼风唤雨，又传说它能扼杀各种害人的妖物。它还扬善惩恶，持刀跟在雷公之后，劈死人间恶人。在《青蛙皇帝》的故事里，它口吐大火，烧死侵扰之敌，保护壮人平安，最后化为一英俊少年，登基当皇帝。它是传说中唯一当皇帝的动物。至今桂西仍保留有祭它的专门节日。

这说明，壮族祖先把蛙当成无所不能的守护神。

四、壮人之所以尊蛙为守护神，是因为他们是发明水稻种植的民族之一。国际农业史专家墨里尔和国内专家丁颖等都认为，岭南是我国和世界水稻发源地之一。农耕，特别是种水稻，需要风调雨顺。但壮族地区在作物生长、收获期常发生大暴雨，影响极大。对青蛙由于特殊生理结构，其某种鸣叫声与阴晴有关。人们不懂科学，以为它和雷王有什么关系，于是尊崇它为神，这是很自然的。

五、壮族祖先之所以把它的形象画在左江一带山崖上，大约有以下原因：第一在左江一带，全年降水量有三分之二是集中在七到九月间，在暴雨期间，江水溢出高达二十四米的左江江岸，淹没两岸农田。所以人们尊崇蛙，求它在雷王那里说好话，管好天池，莫让人间大旱大涝。

第二，从观念上看，壮人认为山崖乃是灵魂栖息之所。壮人同时认为山崖乃通天之路。在山崖上，蛙神可以栖息，可以随时上天。

第三，蛙是不能长时间离开水的，所以它栖息的山崖多在水边。传说水神是蛙神的生母。所以，它住在这里，下可靠近母亲的怀抱，上可通其父亲，是最理想的。水神既是生母，所谓镇水说当然是荒谬的。

我院壮族研究者的“蛙神说”在去年的广西考察学术讨论会上曾被认为最有竞争力的观点之一。以上是我院研究花山崖壁画的新进展。但是，要彻底解开花山之谜，尚须做艰苦的努力。不过，蛙神说总算比较接近于实际，是一种论据比较充分的新观点。

供稿：（瓯云）

## 丝路艺术史的开拓性研究

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在国内外都引人瞩目，而敦煌学由于历史已久，已领风气之先。然而，我国新疆处丝绸之路要枢，在古代一向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交汇的地方。新疆地区的丝路文化艺术，不仅是可以与敦煌媲美的又一宝库，而且源远流长，从当今新疆各民族的文化艺术中，还可以追溯其古西域文化艺术的渊源。最近，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丝绸之路乐舞艺术》、《丝绸之路造型艺术》对新疆地区丝绸之路文化艺术史的研究，作了开拓性工作。

两书均由《新疆艺术》编辑部组织包括汉、维吾尔、哈萨克、锡伯、白等兄弟民族有关专家撰文。《乐舞艺术》内容分两类：一是对以《木卡姆》为重点的维、哈等兄弟民族音乐、舞蹈的专题研究，一是对西域乐舞的专题研究。包括本民族专家在内的专家们对新疆兄弟民族音乐舞蹈及古西域乐舞的特点、妙趣所在的研究与阐发，不仅对专业工作者，富于启发，对一般读者也是提高鉴赏水平的好教材。尤其可贵的是，作者们都以丰富的史料，对古今西域——新疆各民族的乐舞进行比较研究，寻找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在西域乐舞的研究方面，不仅注意到西方乐舞东传对形成古龟兹乐为代表的西域乐舞的影响以及龟兹乐舞对河西、对内地乐舞艺术发展的影响，还注意到中原乐舞的西传。对《木卡姆》乐舞艺术，既注意到追溯到古龟兹乐的影响及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也注意到中原乐舞的影响。有的研究者指出：唐宋时流行于内地的大曲均肇源于古代新疆，而流行于新疆的《十二木卡姆》与唐宋《大曲》在组织结构上与演出规矩上是基本相同的。这些发掘与研究的工作，都表现了丝路乐舞艺术史研究的新的倾向，是从事文化史研究的人们值得注意的。

《造型艺术》介绍了佛教艺术在西域的产生、发展、特色及其对敦煌艺术以至对全部中国美术史的影响。这项研究已越来越被世人所关注。目前的研究规模远不及敦煌艺术，但新疆石窟艺术创立于公元三世纪左右，早于敦煌和中原，直到十四世纪，新疆佛教被伊斯兰教取代，经过长达近千年的不断创造。至今保存的新疆众多佛教艺术石窟，无论其建筑艺术、雕塑艺术、壁画艺术，都是研究敦煌和内地石窟艺术不可忽视的参考。尤其是新疆的壁画艺术，保存无数珍奇瑰丽，是一个日益引起世人注目的大宝库。我们相信对古西域佛教造型艺术的研究终会超越敦煌研究。《丝绸之路造型艺术》一书的开拓意义与第一手资料的价值就在于它展示了这个趋势的开端！

《造型艺术》的第二类内容是新疆的民间工艺美术，这一部分带有伊斯兰艺术的色彩，

（下转第25页）



# 民族音乐学介绍

民族音乐学 (Ethnomusicology) 是介于音乐学和民族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历史上最早提出这一名称的是荷兰民族音乐学家杰普·孔斯特 (Jaap Kunst)。他于一九五〇年在其著作《音乐学》中用“民族—音乐学的现状之研究——其问题、方法及其特性方面”作为付标题。以后，在至今三十多年的学科发展中，“民族音乐学”已为人们普遍接受而代替了这一学科的前身——“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 Musicology)。

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曾经有过不少学者发表了见解。普遍为人们所承认的是孔斯特在其《民族音乐学》一书中所指出的：

“民族音乐学是一门研究欧洲艺术音乐以外所有地区传统音乐的学科，包括一切民族和民俗音乐。而且，它也研究音乐现象在社会科学中的一切连带问题，例如：音乐文化的移入及其变异现象”。坚持这一观点并为之作进一步解释的是美国现代民族音乐学家胡德。他说：“民族音乐学是对一切非西方音乐进行研究的一种方法学，它不仅研究音乐之本身，而且，也研究音乐周围的文化脉络。”（1971年）

对于民族音乐学的具体研究对象，不同时期与不同国家的学者常持有各异的看法。但是，有一点是统一的，那就是研究“文化中的音乐”。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根据不同国家的特点而在研究对象上有所侧重不仅是

客观的，而且是自然的。与民族学有直接联系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应当以民族学研究所涉及的那些民族的音乐文化为主。

至于研究方法，由于民族音乐学所研究的对象包括了各种有书写传统的高文化社会及无书写传统的社会，因此人们通常所采用的研究、分析方法的细则会以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是，大致的过程仍可分为三个阶段：实地考察工作；实验室工作；案头工作。所谓的实地调查并不仅仅是搜集录音资料，还必须特别注意到对文化的体现者所具有的音乐意识、音乐用语、分类概念、分析概念等问题进行探索。这是因为，不同地区与民族的音乐文化常常带有较为明显的形态及表现上的特点。而细致地了解和分析这些个性因素则需要一些特定的手段和方法。此外，在调查中尽可能广泛而深入地掌握音乐与其它各种艺术的联系以及社会文化诸方面的背景也是至关重要的。实验室工作是指对音乐资料的技术构成方面的记录分析、统计、比较等工作。作为一名民族音乐学研究者，无论你是否承认在文化背景中研究音乐，最终都要对其研究对象进行一番形态上的描述，寻找对象与其它音乐的共同规律，从而发现其独特的规律。这是音乐形态方面分析的基本任务。对于声乐音乐，这种分析包括音域、结构、音程与装饰的特点，节拍与节奏、速度、音阶调式与句段的结束



音，以及演唱风格、发声法等内容。对于器乐音乐，除了上述绝大多数方面外，还包括乐器本身的构造和传统演奏法。舞蹈、仪式等社会功能较强的音乐形式的分析还必须与特定的环境场合紧密联系。

根据调查与分析所得出的结果是民族音乐学研究进一步与生理学、心理学、美学、考古学、历史学、生物学、物理学、民族学等众多学科相联系的基本依据。作为一门多角度的边缘学科，它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仅是为解决音乐方面的问题的。在多数情况下，则是为其它学科提供文化中一个方面的佐证。必须注意到：由于音乐是文化中与人的生、心理要求及最经常的生活事象联系紧密的形式之一，它所反映出的问题通常是值得重视的。

民族音乐学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十九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自那时起，对于音乐科学的研究，导致了对民族音乐学本身的研究。它开始被称之为“比较音乐学”。一八八五年，格维多·阿德勒在对音乐进行了广博的研究的基础上，把音乐学划分为两个部分，即历史性研究和体系的研究。在第二类中有三个主要分支：理论、美学、教育。比较音乐学的出现形成了第四个分支。最初这一学科为自己确定的任务是：比较声音的产生和发展、不同民族特有的民歌、不同地区人种的变化，并依据人们音乐及其它本质方面的差异进行文化特色和集团的划分。

随着一八七七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和物理学兼语言学家A·J·埃里斯的科学研究，比较音乐学有了深入的发展。人们开始注重运用有效的科学设备来测量音乐中的各种要素以达到更为科学的要求。哲学家卡尔·施通普夫、化学家霍恩博斯特、人类学家弗朗兹·鲍阿斯等都是这方面的典范。他们在比较音乐学的发展中作出了名垂后世的贡献。

二十世纪初是比较音乐学在美国奠定基础的时代。一部分柏林学派的流亡学者如海尔扎克等人来到美国。二次大战后，受人类学的影响，人们开始抛弃那种孤立地观察音乐现象的传统，而把音乐置入文化整体之中去进行“全面性的研究”。这便对音乐学与其它学科相结合提出了要求，也为孔斯特提出以“民族音乐学”代替“比较音乐学”奠定了客观基础。一九五五年在美国成立的“民族音乐学学会”标志着这一学科的正式形成。这个学会至今已有近2000名成员，是世界此一专门学科最高水准的学术组织。在近年来民族音乐学的发展中比较突出的人物有美国学者胡德(Manfle Hood)、梅里亚姆(Alan Merriam)、涅特(Bruno Nettl)和毛姆(William Malm)等人。其中胡德及梅里亚姆的影响较大。前者着重民族音乐学研究中音乐自身的研究及音乐在文化中心的功能双重目标；后者则侧重文化中音乐的研究。他们的著作——《民族音乐学》(胡德)《音乐之人类学》(梅里亚姆)已成为民族音乐学研究者学习过程中的必读书目。

随着我国音乐理论研究的发展，民族音乐学也越来越受到了人们的重视。自一九八〇年至今，国内已三次召开民族音乐学年会，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水平也不断提高。一些研究机构和院校开始培养这一学科的专门人材。这个新兴的边缘学科必将为我们这个多民族的，拥有丰富文化传统的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供稿：周立 卢光





---

# 计算机语言学

## 在突厥语言研究上的应用

---

捷克语言学家L. HREBIČEK利用电子计算机对现代的五种突厥语——乌兹别克语、土库曼语、哈萨克语、巴什基尔语和土耳其语和玛合木提、喀什噶尔的《突厥语词典》的语言进行了对比。所根据的现代语言材料是苏联科学院出版的诸语言词典，而非口语材料。所利用的音节结构是下述三种即：CV、CVC和VC。

研究比较的结果，使他得出结论认为，从共时来看，这五种现代语言之间的关系是：乌兹别克语——哈萨克语——土耳其语——土库曼语——巴什基尔语。就是说，彼此相接近的语言，之间的关系也最为接近，反之则最远。

从历时上看，用这种五语言的材料和《突厥语词典》相比，就与上述在共时时的表现有所区别。他得出的结论是：与《突厥语词典》语言最接近的是乌兹别克语，第二、三位的是巴什基尔语和哈萨克语，与《突厥语词典》语言关系比较疏远的是土库曼语和土耳其语。

文章作者认为：如果《突厥语词典》确实包括了黑汗王朝语言的词项，而且黑汗王朝语言的发展趋势确实是这样一条历史实际：黑汗王朝时期的突厥语——花喇子模突厥语——察合台语——乌兹别克语、那么可以认为从历史意义上讲也证实了第一音节的稳定性。

作者说：论据的安排使我们能从三个方

面来观察这几种语言之间的区别：

首先，确定了同一种语言里在两种不同位置上的同一种类型的音节结构之间的相互关联性；

其次，比较了在不同语言里在同一种位置上的同一种类型的音节结构之间的区别；

最后，比较了同一种语言中，在不同的位置上同一种类型的音节结构的区别。

通过电子计算机进行分析的结果，作者没有发现什么意外的或是令人惊讶的结果，相反，分析的结果与我们当今对突厥学以及对突厥语言的结构和分类上的研究是相当一致的。这一方法起到了验证的作用，如果运用更广泛的材料，可能会得出更有趣的结论。

作者最后说：突厥语言的第一个音节具有很大的稳定性这一点，尤其是关于辅音的稳定性这一点已被证实。与此相关，我们可以提出一个突出的属于语言方面的反论：即语音的和谐的问题。语音和谐是突厥语族语言在语音上的一个很稳定的原则，它在突厥语族语言大家庭中起很重要的作用，同一个音位（元音的）在词汇层中表现出程度不同的不稳定性。以辅音从属于元音来说它们表现出很强的一致，这种一致性要多于元音从属于辅音。另外，在不同的语言中，元音位置上的一致性要低于辅音位置上的一致性。

乃 路 摘译

## 蒙古古典诗歌研究的新开端

由乔·贺希格陶克陶选编的《蒙古古典诗歌选注》一书共收进三十首诗文，这些诗文都是书面作品。其中一部分作品选自《蒙古秘史》、罗布桑丹津著《黄金史》、无名氏著《成吉思汗黄金史》、无名氏著《阿拉坦汗传》和莫日根活佛著《黄金史》……等历史文献；另一部分选自碑文、岩文等，还有一部分选自达木丁苏荣汇编《蒙古文学作品一百篇》等选集。

书中共加注释1063条，其中每首诗的第一条注解是该诗的出处、作者、写作年代、主要内容和主题思想等方面的简介，其余都是词语注释。

书前有序论，论述了蒙古古典诗歌概况、蒙古诗歌的起源、蒙古古典诗歌的民族特色和蒙古古典诗歌的整理注释等问题。书后附有参考书目。

这本书的出版，值得称赞。

一、这是第一部蒙古古典诗歌注释集，也是一部较严格的、具有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的学术著作。

蒙古学在国际范围内形成和发展已有较长的历史，其中注释工作在国内外的起步也很早。尤其是近年来，蒙文文献的注释工作在国内蓬勃发展。在这方面可以推重道布的《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留金锁的《十善福白史》和乔吉的《恒河之流》等。已有的国内外注释学成果主要是在历史文献方面，其中尤其以《蒙古秘史》为主。但是，包括诗歌在内的蒙古古典文学作品的注释工

作，似乎还没有开始。如今乔·贺希格陶克陶同志的这部《蒙古古典诗歌选注》的出版，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编注者对选文逐字逐句进行校勘，更正和补充了不少字句。过去学者们一致认为《成吉思汗两匹骏马传》有韵文体和散文体两种本，可是本书编注者经过仔细校勘，发现所谓“散文体本”并不是散文，而仍然是韵文。所以把两种本分别称之为“喀尔喀本”和“鄂尔多斯本”。又如，在《满都海薛禅夫人的传说》一诗的原文中，说满都古勒汗的“皇后为……钟金，……后妃为满都海薛禅”，经过校勘更正，“皇后为……满都海薛禅，……后妃为钟金”。另外，还补充了原文中不少遗漏的字句。

二、在注释中有不少独到见解。总的来说，《居庸关云台西壁蒙文诗》、《西宁王忻都碑文结尾诗》、《库台薛禅教导俺巴孩汗十个儿子》、《孤儿舌战成吉思汗九卿》、《简简土阿尔戈聪的传说》、《征服三百个泰亦赤兀惕的传说》、《成吉思汗挽歌》、《妥欢帖木尔汗的懊悔诗》、《满都海薛禅夫人的誓诗》、《朝克图台吉的岩诗》和《六万赞》等诗的注释都很详细、深入。尤其是《居庸关云台西壁蒙文诗》的注释，远远超过了前人的研究。释文指出，此诗文的第一首中歌颂了释迦牟尼；第二首中歌颂了古代印度摩揭陀国阿育王扶植佛教立功劳；从第三首以后歌颂了忽必烈汗扶植佛教，在居庸关等地修筑佛塔等功绩。过去学者们对歌



# 论阿第盖人劳动技能的培养

(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

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历史、语言、经济研究所，厄尔布鲁士，1984年版，170页。

历史学副博士C. X. 马费杰夫的著作包括绪论，三章、结论部分，主要研究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阿第盖人中间普遍流行的，培养下一代人劳动技能的体制问题。为此，作者充分利用了在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卡腊查耶夫契尔克斯、阿第盖自治省等地搜集的野外资料，以及来自阿第盖人口头民间创作、各种文字记载、文学作品中的有关材料。

在第一章中，作者强调指出：与其它民族一样，阿第盖人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劳动能力的培养，这一任务基本上是在家庭内部完成的。

第二章分析和考察民族游戏在训练儿童掌握劳动技能方面所起的作用。

第三章讨论民族经济各部门中劳动技能的培养问题。

供稿：刘小萌

颂忽必烈汗的那些诗句未能正确理解，因此将诗文中utai一词解释成古代印度佛教僧人莲华生的出生地乌仗那。但本书释文中指出，此utai是指中国的五台山，而并非指乌仗那。

三、在蒙古古典诗歌理论研究方面，本书提供了新资料，进行了新的探讨，提出了新观点。

在序论第一部分，系统介绍了蒙古古典诗歌作品概貌，提供了一些新资料；在第二部分，探讨了蒙文诗歌的起源问题。第三部分论述了蒙文诗歌的民族特色或曰性质问题。作者否定了过去学者们提出过的重音诗说、音节诗说和重音、音节并重诗说等三种

观点，并提出蒙文诗是韵律诗的观点。

当然，书中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例如，选编的诗篇数量不多，某些词的注解有重复现象，有些有必要注释的词未注释，而不必要解释的词却加了注释等。不过，这部注释集的出版，必将带来蒙古古典诗歌研究工作的新局面。

供稿：尼玛

原文载《内蒙古日报》(蒙文版)

1986年3月23日第四版。

# 阿 巴 扎 人

(十九世纪的经济与村社组织的历史学、人种学研究)

莫斯科：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145页。

历史学副博士E. H. 达尼洛娃的著作研究北高加索的小民族——阿巴扎人的历史，并重点探讨以往很少有人涉及的北高加索农业村社问题。本书共分绪记、四章、结论三部分。

第一章回顾了十九世纪的阿巴扎民族及其移民历史。阿巴扎人自称“абаза”（阿巴扎），分属塔潘塔（тапанта）和什卡拉雅（шкарауа）二个人种群体。“塔潘塔”一称来自伊朗，意即“平原的居民”，另一部分居址山地的阿巴扎人，即阿巴扎——塔潘京人，被叫作“ашхарец”（阿什哈列茨），意为“山区的居民”。

十九世纪下半叶沙皇政府实行殖民政策的结果，部分阿巴扎人被迫徙至西北高加索的沿边地带，原有的山村被废弃。在山区居民大批迁出山区的同时，由俄罗斯内地省份迁人该地的移民越来越多，在山民开垦的土地上，哥萨克村镇如雨后春笋一般建立起来。

新的阿巴扎山村出现在库班地区的边缘，并与俄罗斯、卡腊查耶夫、诺盖、阿第盖等民族的居民参错而居。而那些散居于卡巴尔达人、阿第盖人村落中的阿巴扎人则被同化。

1864年高加索战争结束之后，沙皇政府着手在北高加索实行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阿巴扎等土著民族开始被纳入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

第二章剖析阿巴扎人村社经济及其生产关系特征。作者指出：十九世纪阿巴扎人经济是畜牧业与农业并存，同时辅之以狩猎、养蜂、家庭手工业的经济综合体。迨到十九世纪末，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在资产阶级改革的过程中，阿巴扎人的经济逐渐退去半自然经济的特质，日愈卷入商品货币关系之中，终于导致村社的解体。

第三、四章分析阿巴扎人的村社组织及其管理机构。阿巴扎人的村社以同一村落的简单村社为主，同时也有由二个或者更多山村组成的结构比较复杂的村社。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阿巴扎人村落的性质呈现明显变化：居民点的庄园消失了，山村的布局改变了，民族成分的同一性也被破坏了。本来，在阿巴扎人的农村公社中仍旧保持着一些传统的村社自治组织，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也随着村社的瓦解而名存实亡。凡此种种变化，均与沙皇在北高加索的政策、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有关。

供稿：刘小萌



# 费孝通《生育制度》、 《江村经济》两书日译本出版

我院兼职教授，著名民族学家费孝通的两本著作《生育制度》与《江村经济》的日译本，不久前在日本由东京大学出版会和山本书店出版部（研文出版）分别以精装本出版。

《生育制度》原在1947年由我国商务印书馆出版，1981年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选入《社会学丛书》再版印行，是费孝通教授早年对于中国汉族及一部分少数民族婚姻、家庭和生育制度的研究。这次在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前所长、著名文化人类学家中根千枝教授的主持下，由横山广子译成日文，并增加了1982年3月费孝通教授在日本东京国际文化会馆的讲演：《中国家族结构的变化》和1983年3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研究会上的报告：《关于家族结构的变化和老人的扶养问题》两文作为附录。费孝通教授为日文版写了序言，回顾写这两本书的经过和自己对有关问题的看法，中根千枝教授在书后写《解说》，对费孝通教授和他的研究工作做了介绍，全书340页，并附有若干幅过去和现在的照片。

《江村经济》即《中国农民的生活》是

费孝通教授1936年在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位著作，用英文在英国出版，1983年由我国新世界出版社编入《中国研究》丛书重印。此次在东京大学小岛晋治教授的主持下，组织了东京大学、学习院大学、东京都立户山高等学校、庆应大学、高知大学及东海大学的浅见靖仁、上田信，大里浩秋、大沼正博、白川多知、武内房司、并木赖寿等人译成日文，以《中国农村的细密画》为题出版。全书除了1936年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外，还包括有1957年的《再访开弦弓村》，1981年的《今日的开弦弓村》和《开弦弓村调查组调查报告》等文章，比较全面地剖析了从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中国南方农村，日译本发表了1936年与1985年时开弦弓村的有关照片。小岛晋治教授并以《费孝通走过的道路》为题，介绍了费孝通学术研究的道路，介绍他在解放前后的工作情况，对他的研究作了高度的评价，全书348页。

费孝通教授这两本日文版的书出版，受到了日本学术界的重大注意和欢迎。

供稿：胡起望



# 卡罗·克来默（主编）

## 《民族考古学论文集》一书简介

“民族考古学”作为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初步形成于本世纪七十年代，目前在外国人类学界颇为热门。卡罗·克来默主编的《民族考古学论文集》是这个领域的一本先驱著作。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了美国人类学会第七十五届年会，会议的议题是“民族考古学——民族志学对于考古学的意义”。会议由克来默主持，本论文集就是这次会议的论文选编。

克来默在该书“导言”中指出，所谓民族考古学，主要就是人类学家在田野考古中借鉴民族学实地调查中局内观察法和直接接触法等调查方法，以期对于考古遗迹发掘中出现的某些罕见的疑难问题，能够寻找到解决的线索。

本书由十二篇论文组成，除最末一篇为“民族考古学的思想观念述评”外，其余都是具体的个案研究。这些个案研究分别取材

于南美洲、中美洲、欧洲、西南亚以及非洲的各类不同组织的社会。它们揭示了人类某些方面的行为与其物质资料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显示了民族考古学方法的多样性。

作者们还对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讨论，如，器物制作及其功能在考古学上的释义，土著居民与考古学家对于事物的不同分类方式，生计与聚居类型之间的关系，各类社会（包括采集——狩猎者社会到有国家的社会）中的定期的居址变换问题，等等。

总之，这些个案研究涉及到的理论问题是多方面的，从中可以看出民族志研究与考古学研究中的整合趋向。因此，《民族考古学论文集》无疑是对考古学文献的一种重要补充。它对于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以及人类学系的学生，都有参考价值 and 启迪意义。

原载《民族考古学论文集》，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

胡鸿保 编译

### 「西藏考古」介绍

《西藏考古》一书是新近故去的意大利著名东方学家G·杜齐先生所著。G·杜齐先生曾先后多次到我国西藏地区考察，收集了大量的文献及文物考古资料。他在藏学方面的著述很多，共有十几本专著，近百篇论文。该书为杜齐先生对其研究成果及主要结论进行的概括总结。全书共分三章十二节，第一章：史前时期及有史时期 第一节：资料少量的发现物 第二节：洞穴 第三节：巨石、陵墓及神殿 第二章：历史时期 第一节：藏王墓 第二节：民用及军事建筑 第三节：寺庙 第四节：佛塔 第三章：西藏艺术的起源 第一节：邻国的影响 第二节：外国工艺品及当地仿造品 第三节：克什米尔及尼泊尔风格 第四节：西藏艺术的统一。第五节：石雕。最后附有结论一节。该书提供的资料比较丰富。书中附有三十三张彩色照片，一百七十七张黑白照片，对于我们了解西藏的考古，文



# 白鸟芳郎新著

## 《华南文化史研究》

最近，日本的六兴出版公司出版了日本著名民族学家白鸟芳郎教授的新著：《华南文化史研究》。这是作者近几十年来致力于中国南方历史和民族研究的一个论文集，体现了日本民族学家对华南民族历史与现况研究的最新水平，是白鸟教授从事研究工作四十年来的一个总结。

《华南文化史研究》全书668页，共分四大部份，即：南诏、大理问题和元朝的征缅；华南史的构成；以瑶族研究为中心的种族问题；周边文化和安的关连。并附有简单的“序”和“结语”。在第一章里搜集作者的论文有：关于南诏，大理的民族和它们的遗民，民家的语言系统；关于云南的蛮族，乌蛮和白蛮；南诏、大理的居民和爨、獠，罗罗，民家族的关系；南诏问题研究概况；父子连名制和爨氏的系谱；以南诏王国形成的研究为中心的，东南亚的复合文化的特性和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类型；元朝势力进入缅甸的考察；从元朝征缅录看掸族的动向。第二章包括华南少数民族从业形态的分析和构成；关于华南非汉族语言研究的摘记；华南土著居民的种族（民族分类和它的历史背景），中国西南部诸土司的民族系谱；试论

从民族系谱看华南史的构成；华南、东南亚地区形成权力结构的基础；西南中国少数民族（彝族和苗族）的考察；研究华南文化史的观点。第三章主要是白鸟教授关于瑶族研究的成果，其中有：评皇券牒和槃瓠传说；从评皇券牒看到盘获传说和瑶族的十八神像；以瑶族的情况说明民族形成的要素；瑶族的文书和祭祀礼仪；以及对畚族祖图《祖像流芳》的介绍。第四章则是对于石寨山文化、铜鼓形式、花纹的分类，来像及意义，以及对留住于冲绳岛的中文家谱的分析。

白鸟芳郎教授194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的东洋史学科，早年致力唐代云南民族历史的研究，1959年曾赴奥地利讲学，60年代后期开始，他多次率领调查团赴泰国北部瑶族地区考察，出版有《瑶人文书》、《东南亚山地民族志》著作。八十年代以来，他多次访华，并深入我国云南、贵州、广东等瑶族地区考察，写了不少促进中日之间文化交流和增进友好的文章。这次白鸟教授的《华南文化史研究》的出版，实现了他多年潜心研究的心愿，将对我国南方民族史的研究，有所启发。

供稿：胡起望

物、西藏艺术的起源及国外的影响，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亦有助于西藏考古工作者全面研究从史前时期至今的西藏考古方面的问题。

本书原著为法文，后由詹姆斯·霍格恩先生译成英文。英译本于1973年在伦敦出版。该书中译本将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供稿人：晋



## ·····彝文《〈劝善经〉译注》出版·····

彝文《〈劝善经〉译注》已于日内出版。四十年代初，马学良教授在云南武定县茂莲乡调查研究彝文时，曾在该地土署图书室中发现这本彝文《劝善经》。据说，这是凤诏时代刻版印行的。马学良教授当时曾函告北京图书馆派人收集保存，并与呗毫张文元老人通译此书，写有《保译太上感应篇》序，但译稿迄未付印，十年动乱中，译稿已荡然无存。1981年，中央民族学院成立彝族历史文献编译组，云南禄劝县派彝族张兴、唐承宗携彝文《劝善经》及部分初译稿来京，即由马学良教授、范慧娟同他们重译此书。彝文《〈劝善经〉译注》终于得以出版。马学良教授在该书《序》中介绍说，彝文古已有之，其创制不晚于明代。彝文文献主要是手抄本，刻本很少。这本彝文《劝善经》算是仅存的最早彝文刻本了。现存的手抄本彝文古籍，多为记述原始宗教的祭经，而这部《劝善经》的内容多为宣教说理，传授知识，通篇以《太上感应篇》为题，结合彝族风俗说教，可谓借题发挥。名为劝善，实为宣扬忠君（奴隶主）思想，因果报应等迷信观念。另一方面，也劝说官吏、奴隶主不要虐待百姓奴隶，甚至对牲畜、昆虫、蚂蚁也劝人莫乱伤害它，似为仁民爱物，实际是为官吏、奴隶主效忠。《太上感应篇》集道家学说的大成。道教的思想渊源与古代神道说教的“神道”有关。“神道”实际是从原始社会多神教演变而来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古代奴隶社会的原始宗教很容易与道教合流。结合民族礼俗、生活模式等伦理观念，更易麻痹奴隶和贫民的反抗意识，因而这部书在当时成为奴隶主得心应手的统治工具。

据考证，彝文《劝善经》似产生于明代水西罗甸王国时代。当时，由于历年征战和冤家械斗，在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压迫下，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日益加剧，不堪压迫的彝族人民和其他被统治的各族人民经常起而反抗，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在这种情况下，奴隶主一方面加强镇压，一方面利用宗教作为进行统治的工具。代表道教的《太上感应篇》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上有所好，御用文人自然对主子效忠逢迎。这是彝文《劝善经》产生的时代背景。

从刻本字体与今存明代金石彝文对比，文字形体相同。后世传抄的彝文古籍，字体多由圆变方，而明代彝文多保留圆体字，文中语言用词及语法结构也与明代彝文作品风格相同。

该书内容充实，涉及彝族宗教礼俗及心理情态、对天地万物的观念，从中可以考察彝族风俗习惯及禁忌的原因。彝文《劝善经》的译述者限于历史条件，书中总的来说是宣扬迷信、因果报应等腐朽观念的，但其中也有不少破除迷信、发展生产的例子。书中反对放蛊、埋人头发、衣物、咒人死病等恶习；提倡保护牲畜，向汉人学习先进思想和技术，发展生产等等，这在当时条件下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彝文古经书，多为五言诗歌体，该书打破五言体，而以浅近流畅的文笔，宣教说理，遣词造句，井然有序。因此本书也是研究彝族语言文学的重要资料。为此，翻译介绍这部书对研究彝族社会经济结构，文化思想发展史、宗教、语言文字等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 「恩加那善人：社会结构与信仰」

恩加那善人，是苏联克拉斯诺达尔边区泰麦尔民族州的少数民族。

第一章研究它的家庭婚姻以及各种亲缘关系。恩加那善人包括十二个氏族，民间传说揭示了某些氏族与埃文基、亚库梯人在起源上的关系。每一氏族均按父系计算，并且恪守族外婚的原则。家庭内实行一夫一妻制。直到三十年以前，仍旧流行弟妻寡嫂的陋习。娶妻须交付聘礼，其额数与新娘父母分给年轻夫妇的财产，在价值上大体相当。婚姻关系易致破裂，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聘礼将归还男方。丈夫是家产的主宰，丈夫亡故，寡妻可以支配归属小儿子的那份财产。如果绝嗣，遗产转归父系近亲领有。

第二章考查恩加那善人传统世界观中的诸要素：宇宙起源观和万物有灵论，关于灵魂与死亡的概念。在有关宇宙起源的传说中，造物主表现为鸟或者鹿的形象。作者认为：这正是恩加那善人来自不同民族成分的明证。恩加那善人将宇宙分为三界，即上界（ВЕРХНИЙ МИР）、中界（ЗЕМЛЯ НИЖНИЙ МИР）、下界（ПОДЗЕМНОЙ МИР）。

在其万物有灵论中，野鹿、银狐等具有经济价值的动物，以及某些山脉、湖泊、河

流是最重要的“神主”（ДУХ-ХОЗЯИН）。而家畜，如狗、鹿等等则是次之一等的“神主”。另外，“神主”有善、恶之分。

族神和家神叫作“科伊卡”（КОЙКА），系由木料、骨头、金属加工制作而成，显示兽类或者人兽合一的形象。萨满法衣上的金属坠物通常是铁制的“科伊卡”。这些坠物形式多样，从各种禽兽乃至天上的星星，应有尽有。“科伊卡”的职能轩轻有别，一种是通用型的，人们可以在病魔缠身、丢失鹿群、血亲复仇等各种场合下，请求它们的帮助。另一种是专用型的，它们的职能限于保证狩猎顺利，庇佑家庭平安等等。在毗邻诸族——雅库梯、通古斯等人看来，恩加那善人的“科伊卡”是最有力量、并且令人望而生畏的神祇。

第三章研究萨满教。每当极夜过后的二月上旬，恩加那善人将欢渡“净宅节”（празднество чистого чума）。届时，萨满向神祇祈求平安、幸福和来年狩猎的成功。惟有大萨满和中等级别的萨满可以主持仪式。他们各有“神助”（ДУХ-ПОМОШНИК），即能够飞升上界、充当萨满助手的神灵。与其它西伯利亚民族一样，恩加那善人认为：萨满的天赋是由他的前辈传下来的。每一萨满均有“神助”，其中最主要者乃是他的先人。可以将恩加那善人萨满的职能归结为：医治疾病、保佑狩猎的成功、找回遗落的物品、驱除恶劣的天气。

恩加那善人的萨满品类繁多。大萨满拥有适用于不同场合的各式法衣，书中附有关于这些法衣的详图。

本书作者А·А·波波夫，科学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1984年版，150页。

刘小萌据《苏联社会科学》（历史）1985年第6期编译。



---

## 《亚——太——美 双语教学 之前景——比较研究》

---

“亚——太——美双语教学之前景：比较研究”，麦楚昌编，纽约，师范学院出版1983。本书所收的文章以各个角度对双语教学进行了研究，特别是关于如何评价具有亚洲背景的学生学术能力的三篇文章。通过这些研究可以预见到双语教学的前景。本书有两篇文章是关于教学的环境与背景的相互作用的，内容十分引人，然而正如该文中也承认的那样，适用性较窄。

本书前半部有几篇新颖有趣，有可能引起争议的文章，尤其是三篇研究文字的。其中，一篇是查理士·李写的，他简单明了地概括了一些亚洲语言的语法结构，使那些只懂印欧语言的人易于了解这些语言。另一篇是剑木博田（Kenji Hakuta）写的，他详尽地探讨了亚洲人在学习英语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第三篇的作者是威廉·S—Y·王写的。文章对汉文、朝鲜文和日文作了极为清晰的描述，阐明了三者历史上的联系。在文章的结论部分，作者对认为音素文字最先进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为证明汉字的优越性，作者提出了几个佐证。其一是：日文把汉字与日文假名混在一起使用，因而拼读错误发生率很低；其二是：一些日本失语症患者忘掉了假名却记得汉字；其三是：以汉字标记英语词汇，在费城教美国诵读困难儿童学习的试验取得了成功。文中引用了奥维德J·L·曾的心理语言学研究成果。使得曾先生的文章更加引人注目。本书亦收有曾先生一篇关于心理语言学的文章。

曾先生的文章主要探讨不同种类文字引起不同认识过程的途径。不同的文字系统分别与语言的不同层次的单位相对应。表示词的、表示音节的和表示音素的文字都有它们自己的“书写符号和语言的对应关系”（第78页）。曾先生无庸论证某种文字形式最先进，但是他提到了汉字的优点。汉字表示词素并构成音节（汉文、朝鲜文皆如此，日文中的许多汉字的读音是多音节的）。音节是语音组合的最小单位，音节文字的使用减少拼读麻烦，有利于日本人学习阅读。音节文字至少在儿童开始学习阅读书写时比西文字母易于掌握。

曾先生文章更引人注意的一点是把研究深入到了大脑的功能区域。文章认为汉字认读用的是大脑的右半球。然而大多数语言功能却位于大脑的左半球。

阿格尼丝·M·厄耶卡瓦的文章是对王先生和曾先生文章的极好的补充。她也提到了汉字的优越性和音节文字作为书面语言书写单位的广泛适用性。不过她的文章的主要内容是青少年何时开始学习第二种语言以及如何充分发展双语阅读能力的问题。她探讨了难度大的文字所引起的问题，也探讨了那些母语没有文字的人在开始学习第二种语言时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后一类问题在太平洋岛国人民中是很普遍的。

语言和文化总是紧紧地纠结在一起，有关语言和文化的观点看法也是五花八门，各有千秋。本书对文字之研究，不能不说是有所发展。

靳希朴译自《美国人类学者》第87卷



# 简评《台湾土著的神话·传说比较研究》

台湾学者何廷瑞先生所著《台湾土著的神话·传说比较研究》（1971年台北出版、英文版，列入娄子匡主编的东方丛书《亚洲民俗、社会生活专刊》第十八集）一书，原系作者提交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民俗所的博士论文。全书包括绪论、理论与方法、分析、概论、结论以及附录故事等部分。它是作者在广证博引中外有关资料、并深入实地考察调查的基础上，对高山族神话传说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综合研究的力作，颇有独到的见解。

一、作者认为：口头文学“都含有一个或数个主题，而主题本身是由若干成分按照逻辑序列组成。”作者从“结构类型和形态学”的观点出发，对高山族神话传说条分缕析，大致分成八类二十一个主题，略计一百种异文（主要的）这种主题分类，突破了常见的“母题”概念与AT分类法的框框，同时，更切合于别具一格的台湾高山族神话传说的实际。

作者还对“复合主题”的典范作品逐层剖析，揭示其主题的组列是“按不同的辈数和年代叙述的”，具有“历时性”；而故事中的许多事项“似同一时期发生的”，具有“共时性”，这样，从纵轴与横轴的结合上，脉络清晰地展示了神话传说的全貌，为窥察高山族远古先民的“基本思想”及其演变另辟蹊径，无疑是有意义的。

二、作者把高山族神话传说置于“环太平洋文化圈”，特别是史前曾经是许多种族与文化交叉并存的东南亚文化区域里，与毗邻的族群的有关神话传说相互比较，探骊得

珠，令人信服地得出高山族神话传说，“同东南亚、东亚、印度中部和东北部、美拉尼西亚、玻里尼西亚和新世界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结论。他指出：“故事中呈现的自然环境是东南亚环境”，出现的动植物具有“大陆特征”，表现的文化宗教背景显然与东南亚有同源关系，因此是典型的“亚洲型主题”。由于台湾高山族“长期同外界隔绝”，没有受到印度、伊斯兰及西方文化的影响，因而，它神话传说较之于基本上被“外侨文化”所湮没或取代的东南亚传统文化，具有独特的纯粹性与原始性，其学术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作者进而列举高山族祖先溯源神话诸如卵生、石生、犬生、竹生等，与“诗经”、“太平御览”、“搜神记”等有关神话的“母题”乃一脉相承，有关粟谷与葫芦、魔爪等传说与日本的同类传说，也同出一源，凿凿有据地论证了流传于包括台湾在内的东亚岛弧的神话传说，渊源于中国古老大陆文化。作者指出：“蒙古利亚人的祖居地大概在东亚的腹地——中国的北部，他们曾是亚洲型主题的传播者”，而中国东亚大陆无疑是东南亚文化尤其是高山族神话传说的摇篮，这样，作者大致勾勒出中国古老神话传说传播的线索。

总之，何廷瑞先生的论著，以其独特的分析，揭示了高山族神话传说的特点及在东南亚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对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高山族文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帮助。

供稿：思 奇

## 《克木民间故事》（第三卷）介绍

一九八四年，瑞典柯中（Curzon）出版社出版了《克木民间故事》（第三卷），编辑者为克里斯蒂娜·林迪尔、简·Öjvind和达姆荣·泰亚宁。此书系瑞典、丹麦、斯堪的纳维亚研究所《亚洲研究专题丛书》第51号。

一九七二年至八一年间，该书编者曾在老挝和泰国的北部从克木人中搜集采录了600多个民间故事——指广义而言——，以及大量歌谣、谜语、宗教经文等。第三卷所载的40多个民间故事，即从上述材料中精选而成。

全书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有“前言”、“故事家的村庄”、“克木民间故事的伦理观”、“克木人文学”、“克木人的神灵世界”等章节。第二部分是故事正文。第三部分有“故事中的民俗注解”、“主题与故事类型”

（皆以“AT分类法”为划分依据）“介绍性文章的注释”、“故事本文的注解”、“民俗注解的诠释”以及“参考书目”等章节。

在第一部分几篇介绍性文章里，编者对克木民间文学作了相当全面的介绍。第二部分故事正文又分两小部分。第一小部分有十类故事：①神话、②“样（Cián）”的故事——“样”即克木人中“智者”、“贤哲”、“文化英雄”之谓。译者——③聪明人的故事。④Nàar的故事。⑤笑话⑥荒谬的故事。⑦奇妙的故事。⑧怪异的故事。⑨寓言。⑩稚语。第二小部分有七类故事（序号按前）：⑪图滕故事。⑫萨满故事。⑬传说。⑭宗教例证。⑮回忆录。⑯编年纪。⑰宗教经文。

蒙宪摘译自《克木民间故事》  
（第三卷）英文版

## 国外中亚研究

国外中亚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对中亚现状的研究，二中亚地区的考古发掘，三语言文字研究，四对文明史的研究。对中亚的政治史、民族史研究未见有新突破。当代学者遗留下来的、或聚讼纷纭的若干重大问题迄今仍未得到进一步解答。原因在于大多数学者不懂汉文。

海青摘自《古陵学报》1986年第5期



# 中国突厥语研究会

中国突厥语研究会成立于1980年，首任会长为包尔汗。该会为中国民族研究团体联合会成员之一。

中国突厥语研究会现有来自各地科研、教学、新闻出版等部门的会员二百五十余名。会员中包括有维吾尔、哈萨克、汉、柯尔克孜、回、乌兹别克、塔塔尔、裕固、撒拉、锡伯、朝鲜等民族的突厥语文研究者，他们中的大部分活跃在新疆各地。

该研究会成立六年来先后召开过四次学术讨论会（1980、1982、1983、1985）。1980年的学术讨论会是以“突厥语族语言的新术语问题”为中心的；1983年是以“方言学问题”为中心的；1985年是以“语言史问题”为中心的（1982年是与新疆有关单位共同组织的，没有确定中心讨论题）。每次讨论会均有一部分水平较高的论文。

该会办有《突厥语研究通讯》，并曾编印过《中国突厥语族语言概况》，主要供会员及有关单位、人员参考、交流信息。

1982年，该研究会曾与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配合，共同组织了关于我国突厥语族语言研究的学术讲座，共二十讲。听众主要是民院学生和本会会员。

该研究会自成立以来，开展了同国外学者的学术交流活动。1982年，研究会邀请了德国突厥学家葛玛丽教授来我国访问。她在北京、乌鲁木齐作了数次学术报告，并与我国学者（多数为我会会员）进行了多次座

谈。此外，也曾多次请有关的来华专家同会员座谈，进行学术交流。在研究会会员中，有些近几年出国讲学、访问的同志如中央民族学院的耿世民、胡振华、魏萃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陈宗振等，也利用可能的机会宣传了我国在突厥语研究方面的成果，与国外同行、有关学术单位进行了学术交流，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几年来，研究会会员在各自所在单位的领导下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大批的科研成果。例如，《突厥语词典》、《古代维吾尔诗歌》、《维吾尔古典文献》、《真理的入门》等一批古代语文研究成果；《维吾尔语简志》、《撒拉语简志》、《西部裕固语简志》、《哈萨克语简志》等描写语言现状的专著；发表在《民族语文》、《语言与翻译》和中央民族学院、新疆大学、西北民族学院、青海民族学院等高等学校学报上有关突厥语的大批论文（总计大约三百多篇），等等。这些成果引起了国外同行学者的注意，受到了他们的好评。

突厥语研究会会员，特别是中老年会员，在培养人才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绩，除陆续培养了大批突厥语文专业（包括古代突厥语文专业）的大学本科生外，还培养了一批硕士研究生。青年会员，有许多基础扎实，刻苦好学，大有作为的人才，在目前比较好的条件下，已取得了一些令人欣喜的科研成果。



## 国外突厥语研究机构

除了苏联、土耳其这样突厥民族人口较多的国家以外，西欧的德、奥、法、英、瑞典，东欧的东德、波、匈、捷、保、罗马尼亚和美国、日本等国家均有突厥语文教学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学术刊物，有的还时常召开学术会议、国际学术会议，当然，他们都拥有一批专家，有些是世界知名的专家。其中以苏联的突厥语教学与研究，历史悠久、人才众多、成果最大。目前，主要由操突厥语民族组成的各加盟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均有科学院的语言所（或语言文学所）和高等学校，从事本族或者相关各族语言文字或古文献的教学研究工作。全苏有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语言研究所（内有突厥语——蒙古语部）等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全苏突厥学家委员会（学术团体），他们每年召开一次学术讨论会，并协调各地教学研究机构的工作，组织搞较大的协作项目。现在主要搞苏联境内突厥语方言地图集，突厥文文献图录等等。苏联拥有康诺诺夫、捷尼舍夫等世界知名的突厥学家不下二十人。1970年前，突厥语文论著多发表在《语言学问题》杂志上；1970年后创办了在巴库出版的《苏维埃突厥学》双月刊，每期相当于汉文三十万字左右。这是当代关于突厥语研究的最重要的国际性学术刊物。

土耳其，以伊斯坦布尔大学、安卡拉大学为中心在全国各大学进行本国语文的教学、研究，同时也有少数专家研究古代突厥语文，包括突厥文、回鹘文、奥斯曼土耳其文等文献，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著作。例如，《突厥语词典》即是在土耳其发现，并首次用土耳其文翻译出版的。近年来出版的土耳其语《辞海》也是重要的区著。他们也拥有几位国际知名的专家。不仅在土耳其语方面他们最有权威，而且在古代突厥语文献的研究方面成绩也是最突出的。从三十年代起，他们就成立了“土耳其语研究会”（也可以译为“突厥语研究会”），每年均出“年鉴”（即学报）。近年来又成立了“突厥语研究中心”，每隔两年召开一次“国际突厥学大会”，去年召开了第五次大会。

西欧各国大都从研究土耳其语文开始，即由一些外交人员、大学师生学习土耳其语言、文化、历史开始研究突厥语族语言文字。近数十年来，在英国、瑞典、丹麦等国，突厥语的研究有渐趋萎缩的趋势，只保持少数土耳其语的教学单位。在西德，汉堡、波恩、哥廷根、梅因茨等地大学均有关于突厥语言，特别是古代突厥文献的研究机构。其名称不一，如有的隶属于东方学、民族学的研究中心，等等。他们有研究回鹘文献的强大力量，有一些世界知名的、卓越的专家如葛玛丽、焦费尔等教授。近年来的主要成果有《回鹘语词典》、《波斯语中的突厥、蒙古语成份》等巨著和关于普通突厥学理论的一些重要著作。

奥地利，以维也纳大学中心，进行突厥语族语言教学。近年来，有关于维吾尔语的课程。著名的突厥语专家门格斯、提耶孜等都曾在这里工作。

法国，在巴黎第三大学设有突厥学学院，在斯特拉布尔格大学设有突厥语研究所，在马



赛第一大学斯拉夫学东方学院也有专门的研究机构。法国的路易·巴赞、哈密顿、格·依玛尔特等都是研究突厥文、回鹘文或柯尔克孜语的知名专家。他们都来我国进行过学术交流。法国出版的《突厥学》杂志，发表的文章水平较高，在世界突厥学界有一定影响。

从过去的一些情况来看，在东欧各国主要是东德和匈牙利在突厥语文研究上力量较强，成果较多。东德保存着三十年代从我国取得的古代突厥、回鹘文献，在柏林的科学院有一批专家研究这些古代文献，其中有的是世界知名的专家。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有研究《玛纳斯》的，与我国突厥语文工作者也有联系。

匈牙利科学院、布达佩斯大学均有几位著名的学者研究古代突厥语文、土耳其语及方言，出版了一些专著，发表过许多重要的论文。匈牙利在突厥语研究方面，是东欧各国中水平最高的国家。

在美国，突厥语的教学研究开始较晚，但近数十年来，美国吸引了一些突厥学家，有几位是国际闻名的专家，如赛诺尔、波培等教授在各大大学从事突厥语文教学和研究。他们有两个主要的中心，一是华盛顿大学，那里有亚洲语言文学系，有几位专家从事突厥语文，包括塔塔尔、土耳其、哈萨克等语文的教学。最近有可能请我国学者去讲授维吾尔语文。一是印第安纳大学，有个乌拉尔——阿尔泰学系和中亚研究所。近年来，出版了许多关于突厥语文的专著。此外，在哈佛大学（波士顿）、哥伦比亚大学（纽约）也有一些系或研究所、研究中心在进行突厥语文教学工作。主要从事土耳其语、乌兹别克语言、文学的教学。哈佛大学有《突厥学报》，不过其内容是十分广泛的，包括政治、经济、艺术、宗教、建筑……即广义的突厥学学术刊物。在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历史系，过去召开过几次突厥学讨论会，去年，他们组织了中亚学会，这是美国唯一的这种组织。他们有个刊物是《国际突厥学杂志》内容也是广义的突厥学，不限于语文。此外，美国加州大学的洛杉矶分校、伯克莱分校等大学也有一些从事土耳其语或其它突厥语教学研究的教授。

在日本，许多研究亚洲（包括东亚和中亚）历史的学者掌握甚至精通突厥语文，包括古代的突厥文献、回鹘文献，在这方面有许多杰出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语言学家进行突厥语，主要是土耳其语文的教学研究。例如，东京外国语大学的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就有一些学者在研究土耳其语或中国的维吾尔语。日本已出版了维吾尔语日语小词典，对《高昌馆来文》等文献进行了研究，并出版了专著。目前，日本突厥语研究者准备进一步开展对现代维语、现代柯语的研究，已有现代维语博士研究生。

突厥学（广义的或狭义的）已成为国际性的学问之一，它与蒙古学、藏学一样，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上接第46页）

文字。但在十月革命以后不久，先搞民族文字的拉丁化（20～30年代），又搞斯拉夫化（30～40年代），故现今苏联的二十多个民族中大部分均有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文字。在土耳其，直到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前

都使用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文字（即奥斯曼土耳其文），共和国建立后不久，进行了文字改革，1928年以后改用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土耳其文，沿用至今。



## 附：突厥语族语言文字

### 一

在我国五十六个民族中，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有七个民族，他们是：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撒拉、裕固、乌兹别克、塔塔尔。按1982年人口普查的资料，总计约707万多人，但因有些群众使用其他民族的语言，故实际操突厥语族语言的约702万多人。这样，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占全国五十六个民族数的八分之一，在少数民族人口中也约占八分之一强。此外，经过我国学者的调查研究，逐步发现除上述七种语言之外，还有土瓦语（又被称为柯克蒙恰克语，分布在新疆北部阿勒太地区）等使用人口很少的其它几种突厥语。

在操突厥语族语言的七个民族中，现在有通用文字的是人口较多，居住较集中，语言使用面较广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三个民族。他们使用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和柯尔克孜文。乌兹别克和塔塔尔两个民族原有文字，但在我国居住分散，人口稀少，故本族文字没能全面使用，也无出版机构和出版物，他们在工作、学习中以使用维吾尔、哈萨克文为主。撒拉、裕固两族在机关、学校等方面一向使用汉语文。

### 二

当今世界上总计约有三十五个民族操突厥语族语言，人口约一亿。主要分布于苏联（二十三个民族，四千万人口），土耳其（五个民族，四千万人口），伊朗（十个民族，近八百万人口），中国（七个民族，七百万人口）。此外，在蒙古、阿富汗、伊拉

克、叙利亚、约旦、黎巴嫩、沙特阿拉伯、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塞浦路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和南斯拉夫均有少数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但分布在各国的人数都不超过一百万。近数十年来，有一些土耳其人移居德国，据说有一百多万，他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劳力缺乏时期迁去的，有些已定居在该国，但不一定取得该国国籍。除德国外，欧、美、澳三大洲还有不少说突厥语的侨民。

在这三十多个民族中，人口在一千万以上的为土耳其、乌兹别克、阿塞拜疆三个民族，人口在百万以上的有哈萨克、塔塔尔、维吾尔、土库曼、柯尔克孜、楚瓦什、巴什基尔七个民族。因此，我国的七个民族中维吾尔是主要分布于我国的人口较多的民族；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兹别克、塔塔尔都是主要分布于苏联境内的跨界的民族；撒拉、裕固是人口较少并且只分布于我国的民族。

总之，我国的突厥语族语言占全世界突厥语种数的五分之一，人口约占总人口数的十四分之一。

在古代，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是文化比较发达的，据有年代可考的文献来估计，大约六世纪即已使用突厥文（或称鄂尔浑—叫尼塞文），这就是古代的突厥、回纥、黠戛斯、骨利幹人使用的文字。大约从九世纪到十五世纪，以回鹘人为主，使用回鹘文。十世纪以后，又逐渐采用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喀喇汗朝（黑汗王朝）文字，察合台文，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形成现今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文字。在苏联中亚地区，各突厥民族也使用过上面所提到的各种

（下转第45页）